臺大歷史學報第 75 期
2025 年 6 月，頁 61–112

BIBLID1012-8514(2025)75pp.61–112
2023.12.3 收稿，2024.12.9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06_(75).0002

# 明後期大同鎮麻氏將門考論

徐　成*

## 提　要

明後期九邊大同鎮形成了以麻祿、麻錦、麻貴、麻承恩等人為代表的麻氏將門，其來源是元末明初東勝州編入大同右衛右所的「回回人」，初為普通軍戶，以靖難之役始獲基層世職。一方面，他們作為衛所制下的山後達官，聚族編防，早有根基；另一方面，在北部邊防體制危機下，他們在鎮戍營伍制度中得到了新的機會。麻氏凡逢戰事皆舉家參與，獲捷累累，同時積蓄大量人馬、財產等資本。在軍政制度設計的保障下，其族長期深耕本土，即便調防也多就近陞轉，且祖孫、父子、叔侄、兄弟往往同營共事，甚至連續擔任同一職務，從而擁有豐富的仕履經驗和人脈網絡。在明後期文尊武卑的環境下，麻氏又以通好文官為奧援，為家族發達鋪路。但麻家亦因貪腐、交結而捲入朝堂爭鬥，且在明季一系列戰役失利，人員、經濟、政治地位遭受重創，勢力漸衰；明清鼎革後，部分成員嘗試轉型綠營而未能持續，最終完全沒落。綜觀之，麻氏代表的邊鎮衛所將門，本質上是時代危機和制度影響下的產物，其興衰背後反映著明後期乃至清初軍事政治史的發展特點。

關鍵詞：明後期　大同鎮　邊鎮軍戶　麻氏將門　鎮戍營伍制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
300350 天津市津南海河教育園區同砚路 38 號；E-mail: thomasxc@foxmail.com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大同鎮麻氏的來源與世系辨正
二、隆、萬前期麻氏家族的崛起
三、萬曆中期以後麻氏家族的沒落
餘 論

## 前 言

早在孟嘗君的時代，便有「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的諺語，[1] 將門將種，淵源久矣。秦之蒙、王，楚之項氏，漢之周氏，孫吳之陸氏，中古以來則如唐之薛、郭以至於世代相繼的藩鎮軍閥，再如北宋眾多將門，到元代又有諸如漢人世侯的出現。從早期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文武合一，到唐宋以後逐步文武分途，雖然不同時期之將門性質未必等同，表現形式也有歧異，但將門發展卻是先秦以來幾乎從未徹底消失的現象。尤其在中世以後，文武分野逐漸井然、軍事經驗專門化程度愈來愈高，統治階層對武人軍事經驗的實際需求，結合武人家族企圖保護家族利益，便容易產生軍事權利的承繼，成為將門萌生的根苗。一旦出現，亦不免與廟堂、江湖、袍澤、敵國多方之間糾葛纏繞，牽連著軍事局面乃至政局的演變浮沉。因此，將門現象雖是軍事史的問題，也是政治史的問題：談將門必談戰爭，戰爭本質上是政治的延續，是一種解決政治問題的最極端手段；戰爭的政治目的往往由政治家討論，戰略目標則多由武人利用其具體的軍事經驗實現。即便非戰之時，將門也往往作為官僚階層的一員，介入具體的政治運作，共構當時的政治生態。故而學界以往研究將門，大多從政治史、軍事史的層面加以綜合考量。

到了明代，將門在政治軍事制度的特殊影響，與現實邊務危機頻仍的雙重作用下，發展出邊鎮衛所將門這一特色形態：九邊重鎮是明廷防

1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點校本），卷 75，〈孟嘗君傳〉，頁 235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務的第一線，而衛所制度又是明代軍事制度的基礎，在此情況下形成的邊鎮衛所將門，在整個明朝，尤其到萬曆（1573–1620）以後，成為明代守邊、征伐的重要軍事力量，在當時便有「語稱將有將種，除世爵外，如東李、西麻、土達、祈、魯及王、杜、尤、蕭等族，家世曉暢兵事，從中推選，必多雋傑」的評價。[2]而大同鎮麻氏更是其中的傑出代表，在明代中後期政治史、軍事史上大放異彩，武功顯赫，閥閱累傳，與鐵嶺李氏並稱「東李西麻」。[3]作為典型的明代邊將世家，麻家的衰落乃至瓦解，與「鼎革」的脈搏相應，甚至持續到清初。研究麻氏家族這一特殊個案，不僅有利於深入了解衛所制度、九邊鎮戍、武官制度運行實態、明蒙戰爭、遼東戰爭等軍事史等課題，亦可推進明後期政治史、明代家族史、明清易代史之探討。但可惜現有研究對麻氏家族史的梳理尚顯不足，諸多問題有待商榷。[4]這一重要的軍事家族從何而來，如何興起？又

2 苕上愚公，《東夷考略》（臺北：正中書局，1981 據玄覽堂叢書本影印），頁 174–175。

3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卷 238，〈麻貴傳〉，頁 6203。

4 關於明代將門的研究，學界已有一些個案積累，如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21–196；肖瑤，《李成梁與晚明遼東政局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曹循，〈明後期的邊鎮將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3 期，頁 26–32；綿貫哲郎，〈再論祖大壽與「祖家將」〉，《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6 期，頁 26–40；楊海英，〈明清易代之際的張應種及其家族〉，《軍事歷史》2017 年第 6 期，頁 21–27；曾磊，〈明末關寧軍性質的再討論——以「祖家將」為核心的觀察視角〉，《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1 期，頁 107–116。以上諸文卓有貢獻，然在地域上，多集中於史料較為豐富的遼東地域軍事家族，九邊除遼東以外的將門，尚須更多揭示，以俾在未來描繪明後期九邊將門相對完整的概貌。而細化到關於麻氏將門的研究，則基本集中於麻貴，甚少涉及其他成員，這與《明史· 麻貴傳》篇幅設置不無關聯。參見白壽彝，《回族人物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卷 25，頁 95–102；王德功，《麻家將》（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黑正宏，〈明王朝的另一個長城——麻貴〉，《回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45–49；李大鈞、李大宏，〈山西大同右玉麻氏家世與碑銘〉，收入馬文清主編，《回族譜序與宗源考略》（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頁 891–899；趙玉珍，〈明清時期長城沿線回民聚落的變遷——以大同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1）；紀海龍，〈麻貴軍旅行實考析〉，《回族研究》2020 年第 2 期，頁 47–52。以上研究，大多不脫《明史》

臺灣大學圖書館

是因何而衰？其在明後期的軍事政治史上是何種樣相？造成該狀況的原因為何？他們「世傳將種」，與歷史上擁兵自重、霸據一方的將閥豪勢有何區別？

表一 麻氏碑刻情況詳表

| 碑名 | 立碑時間 | 誌主 | 撰者及書者 | 備註 | 通稱 |
|---|---|---|---|---|---|
| 大明誥封麻大夫并劉氏墓誌 | 約萬曆前期 | 祿及妻劉氏 | 不詳 | 夫婦合葬墓誌蓋 | 麻祿夫婦墓誌蓋 |
| 明故驃騎將軍麻公諱祿墓誌 | 約萬曆前期 | 祿 | 不詳 | 麻祿本人墓誌蓋 | 麻祿墓誌蓋 |
| 誥贈鎮國將軍麻公諱富墓碑 | 約萬曆前期 | 富 | 不詳 | 墓道石刻 | 麻富墓道石刻 |
| 大明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母王氏墓誌銘 | 萬曆三十五年（1607） | 王氏 | 王世揚篆蓋 | 墓誌蓋 | 王氏墓誌蓋 |
| 大明誥封一品太夫人王氏暨榮祿大夫東泉麻公合葬墓誌銘 | 萬曆三十五年（1607） | 富及妻王氏 | 王象乾撰，王世揚篆蓋 | 誌石 | 麻富夫婦合葬墓誌 |
| 明誥封特進光祿大夫麻公暨配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 萬曆四十七年（1619） | 貴及妻沈氏 | 楊鎬撰，張爾基書篆 | 誌石 | 麻貴夫婦合葬墓誌 |
| 明故誥封夫人沈氏墓誌銘 | 萬曆九年（1581） | 貴妻沈氏 | 鄧林喬撰，書者不詳 | 誌石 | 沈氏墓誌 |
| 大明誥封光祿大夫祁山麻公墓誌銘 | 約天啟元年（1621）以後 | 承恩 | 不詳 | 墓誌蓋 | 麻承恩墓誌蓋 |
| 明誥封一品夫人尹氏墓誌銘 | 萬曆三十二年（1604） | 承恩妻尹氏 | 劉汝康撰，劉餘澤書篆 | 誌石 | 尹氏墓誌 |
| 明故協鎮薊東副總兵官都指揮使少泉麻公墓誌 | 萬曆三十八年（1610） | 承訓 | 劉餘澤撰，樊東謨書丹 | 誌石 | 麻承訓墓誌 |
| 明遼東義州副總兵贈光祿大夫右都督似泉麻公墓志銘 | 約天啟二年（1622）以後 | 承宗 | 郝某撰，王家象書丹 | 誌石抄件 | 麻承宗墓誌 |

資料來源：《麻氏家族碑刻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右玉縣委員會編，《右玉文史資料》第 23 輯（右玉：山西省右玉縣史志辦公室，201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右玉縣委員會編，《右玉文史資料》24 輯（右玉：山西省右玉縣史志辦公室，2016；以下省略編者名）；麻氏家族抄件（右玉：右玉縣麻氏家族後裔麻玉先生藏本）。

竊白，且亦有不全面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根據麻家多通出土墓誌與其他有關碑刻（詳表一），以及相關方志、奏疏、文集、檔案等多種史料，綜合筆者的田野調查，將原本模糊不清、史料零散的麻氏興衰歷史，作長時段的動態考察，力求澄清其本來面目，並希為明後期邊鎮將門研究提供更深入細化的參照樣本，唯譾陋之處尚祈方家賜教。

## 一、大同鎮麻氏的來源與世系辨正

既往關於大同鎮麻氏的研究，囿於史料匱乏，大多僅言其為大同右衛（今山西右玉）人，幾無涉及麻氏來源、編衛之始末。即便有所說法，也存在史料誤讀和語焉不詳之處，如王德功認為麻家祖籍甘肅祁山地區，是善養戰馬的回族，右衛人麻璋任太僕寺卿，回鄉招募族人麻全為養馬軍戶，遂落籍大同右衛養馬。[5]但這種說法疑點甚多，遽難輕信。明制，行太僕寺並不負責養馬軍戶的招募落籍，養馬軍戶也並不編入普通邊衛，而是編入專門的群牧千戶所，群牧千戶所則歸屬各都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瀋陽群牧所襲替世系簿》就是這類養馬軍戶存在的實證；[6]而且王氏很可能是據〈麻富夫婦合葬墓誌〉錄文裡「祁山麻大將軍」[7]一句鋪陳演繹，誤以為祁山是麻家祖籍。但實際上祁山是富子承恩的別號。[8]李大鈞、李大宏則以金代大同有麻秉彝、明代《大同府志》載詩人麻革，以及右玉縣麻氏自身的口述傳說為據，說明麻氏家族在元代就居於右衛所在地。[9]但是這一說法仍較為模糊，並未說明麻氏究竟由何

5 王德功，《麻家將》，頁 1–12；王文海，〈中華武將世家：麻家將〉，收入李堯、高海主編，《朔州歷史文化研究文集續編》（太原：三晉出版社，2017），頁 532。

6 《瀋陽群牧所襲替世襲簿》，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75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影印），頁 1–60。

7 〈麻富夫婦合葬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右玉：右玉縣博物館藏）。

8 〈尹氏墓誌銘〉，收入《右玉文史資料》第 24 輯，頁 123。

9 李大鈞、李大宏，〈山西大同右玉麻氏家世與碑銘〉，頁 891。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處遷來，且援引的證據有不確之處：麻秉彝、麻革並不是大同人，而是臨晉縣（今山西臨猗）人，他們並未定居大同，只是遊宦此地。[10]而幾乎所有麻氏家族成員在現存石刻題名裡的籍貫，若非大同右衛及其代名詞「恒陽（即恒山之陽）」，便是「雲中」等泛稱雁北大同一帶地區的古雅名稱，[11]這使麻氏祖源蒙上一層迷霧。

考究麻氏來源的原始材料，最權威者應是武職選簿，這是參考功次選簿、零選簿、獲功堂稿、核冊題覆、內外二黃、節年選過審稿、貼黃、誥命、手本、箚付、卷宗、革冊等紀錄慎重詳細地比對而成。[12]惜大同右衛選簿已丟失，所幸還有其他類似簿冊檔案可以佐證，查天啟二年（1622）四月《新官替職選底》載：

> 麻承岱，年三十四歲，東勝州人，係大同右衛老指揮僉事麻蓁親侄。查麻蓁以舍人累功陞都指揮僉事，內除長樂等處功，以正千戶陞揮僉；蔚山等處功，以揮僉陞都揮僉。部功共四級，例不世及。其所得世及者，正千也，而蓁且故絕矣。承岱以侄承伯，於例復應減一級，合准襲副千戶。[13]

麻蓁是麻家成員、麻貴（1538–1616）族弟，曾隨麻貴參加萬曆朝鮮之役，亦曾與麻岩（?–1619）參與征遼。麻岩在薩爾滸之戰中陣亡，留下少數家兵健卒，開原兵備道韓原善（1584–1628）考慮到家丁有一定程度的歸

10 李維楨纂修，萬曆《山西通志》（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刻崇禎補刻本），卷 19，頁 31a；傅淑訓、曹樹聲纂修，萬曆《平陽府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順治遞修本），卷 8 下，頁 37b。

11 如〈明萬曆十二年「翰雲」門額刻石〉拓本（赤城：赤城博物館藏）題名裡的「雲中麻承勳」；〈萬曆三年敗胡堡「永寧」石匾〉題名「恒陽麻錦」，收入周亮等編，《三晉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魯區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 48。關於右衛在明代別稱恒陽，可參蔣廷梁，〈顯明寺重修碑記〉：「大同右衛，郡曰恒陽。」見劉士銘修，王靄纂，雍正《朔平府志》（劍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雍正刻本），卷 12，〈藝文〉，頁 71a。

12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學生書局，1987），頁 173。

13 《新官襲職選底》，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75 冊，頁 26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屬性，又因麻蓁和麻岩同族同宗，因此上疏請許麻蓁代管。[14]而《新官替職選底》屬於選簿類檔案，由兵部負責記錄，開列武官姓名、年齡、籍貫、從軍歸附來歷、立功陞授職役、襲替情況等多種訊息，[15]其標注來源具有官方可靠性，並且明代軍戶既不分戶，其祖籍理論上亦是世承無改。[16]意即檔案中所載麻承岱（1589–?）「東勝州人」的祖貫，是大同右衛麻氏的真正來源。此事牽涉元末明初以衛所歸附人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內遷問題，折射著這一時期長城內外人群流動的時代背景，與明初討伐漠北、掃滅殘元的戰爭息息相關。

東勝州在今鄂爾多斯東勝區到呼和浩特托克托縣一帶，元代屬於大同路管轄，洪武二年（1369）改大同路為府，東勝州仍屬之。為了應對殘留漠北的北元勢力，洪武四年（1371）正月一度將其廢州改衛；[17]同年三月，明太祖命「山北口外東勝、蔚、朔、武、豐、雲、應等州極邊沙漠，宜各設千百戶所，統率士卒、收撫邊民，無事則耕種，有事則出戰」，[18]是官方第一次計劃性地將東勝州邊民籍作軍戶；之後將該州邊民陸續南徙，直到洪武六年（1373）正式棄置東勝州，應是有記載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州民內遷。[19]同時，這段時期還有東勝州的蒙古諸部落首領主動內附，如洪武四年都連帖木兒自該州率眾歸附，被編為 5 個千戶

14 韓原善，〈危邊不容再壞畫策宜圖萬全條議〉，收入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4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據舊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卷 20，頁 663–664。

15 梁志勝，《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30–31。

16 關於明代軍戶與原籍的關係問題，參于志嘉，〈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兼論明代軍戶制度中戶名不動代役的現象〉，收入邱澎生、陳熙遠主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81。

17 張廷玉，《明史》，卷 41，〈地理志二〉，頁 974。

18 《明太祖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62，洪武四年三月癸巳條，頁 1196。

19 《明太祖實錄》，卷 85，洪武六年十月丙子條，頁 151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及 42 個百戶所。[20]洪武六年之後的東勝衛屢有設、廢，其最主要從軍人口來源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在寧武以南的地區籍民，這與東勝州民關係不大。[21]總之，明初曾數次設立、廢置東勝州、衛，所在居民也陸續歸附、內遷。[22]麻家作為漠北山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百姓，[23]在此過程中自東勝州被內遷入大同右衛，並編入軍籍，時間點最可能是在洪武四年到六年之間。從麻承岱列名《新官替職選底》，以「新官」後裔承襲祖輩武職來看，麻家先祖應該是參加「奉天征討」而獲得世職。明制，太祖從征武臣和永樂以後立功武臣所封世職，謂之「舊官」；參與靖難武臣所封世職，謂之「新官」。[24]意即麻家先祖在永樂初年立功，因靖難之役由普通軍戶獲低級世職。而麻家屬於大同右衛哪一所呢？從麻貴幼子承宣名列大同右衛右所副千戶來看，麻家被編入的是右所。[25]

這樣，我們也就更加理解前述部分學者認為「麻璋招募同族麻全到右衛養馬落戶」一說的不可靠性。按麻璋其人，正德《大同府志》作「麻漳」，正德丁卯舉人，正德丁丑進士；[26]雍正《朔平府志》作「麻璋」，正德丁卯舉人，正德丁丑進士，在右衛城有為其所立的進士坊，其墓在城北二十里。[27]兩志所載履歷相合，也就是說雍正《朔平府志》的「麻

20 《明太祖實錄》，卷 60，洪武四年正月癸卯條，頁 1179。

21 郭紅，〈明代山西行都司移民〉，《軍事歷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頁 103。

22 關於東勝州及衛所的變遷，可參吳緝華，〈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4 本下冊（1963 年 12 月），頁 649–660；盧緒友，〈明初東勝州衛置廢諸問題辨析〉，收入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3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189–193。

23 〈崇禎元年重修右衛禮拜寺碑記〉（右玉：右玉清真寺藏）；〈天啟二年重修禮拜寺碑記有銘〉（大同：大同清真大寺藏）。

24 《兵部武選司條例》，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 1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10 據天一閣藏明本影印），頁 362–363。

25 楊時寧，《總督宣大山西軍門奏議》（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卷 8，〈議薦將材疏〉，頁 46a。

26 張欽纂修，正德《大同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據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影印），卷 11，〈人物〉，頁 328–329。

27 劉士銘修，王靄纂，雍正《朔平府志》，卷 9，〈選舉〉，頁 4a、10a；卷 4，〈建置〉，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璋」乃襲自正德《大同府志》的「麻漳」，只是傳寫過程中誤「漳」為「璋」。又按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殿試的官方紀錄登科錄，麻漳雖隸山西行都司官籍，然祖籍清楚標明是大同縣。[28]而回回麻氏，官方檔案登記的祖籍是東勝州。大同縣在大同右衛的東邊，而東勝州的位置經歷幾次廢置遷移，始終在大同右衛的西北方。[29]因此從地理方位上來說，麻漳的先祖是由東向西遷入大同右衛，而麻貴的先祖是由西北向東南遷入大同右衛，兩者遷徙方向南轅北轍，關係不言自明。

談及麻氏世系，既往研究雖已注意到利用部分碑刻與傳世文獻對勘，但囿於傳世史料匱乏，加之未能全面掌握其家族所有碑刻，或舛誤較夥，或率多遺漏，仍有可商之處。例如李大鈞、李大宏、紀海龍等學者均未注意到麻貴的次子為承□（似「誥」字），而非承訓，也未注意到承訓有幼子生哥。[30]現據筆者調查到的所有麻家及其姻親的家族碑刻，[31]重新梳理世系如圖一。

由上可知，麻氏自麻承勳兄弟開始，有了較為明晰的輩分可稽：承字輩—山字輩—胤字輩，其人丁命名也從全、祿、錦、富等看不出行輩的常見單字，變成承恩、承詔、承宣、巍、崔、胤麟、胤奇等一目瞭然的文雅雙名或單名，這種由質而文的變化，可能與麻氏官位權勢逐漸陞進、宗族日益壯大、派屬歧分、丁男愈夥的發展歷程有關。

---

頁 90b、10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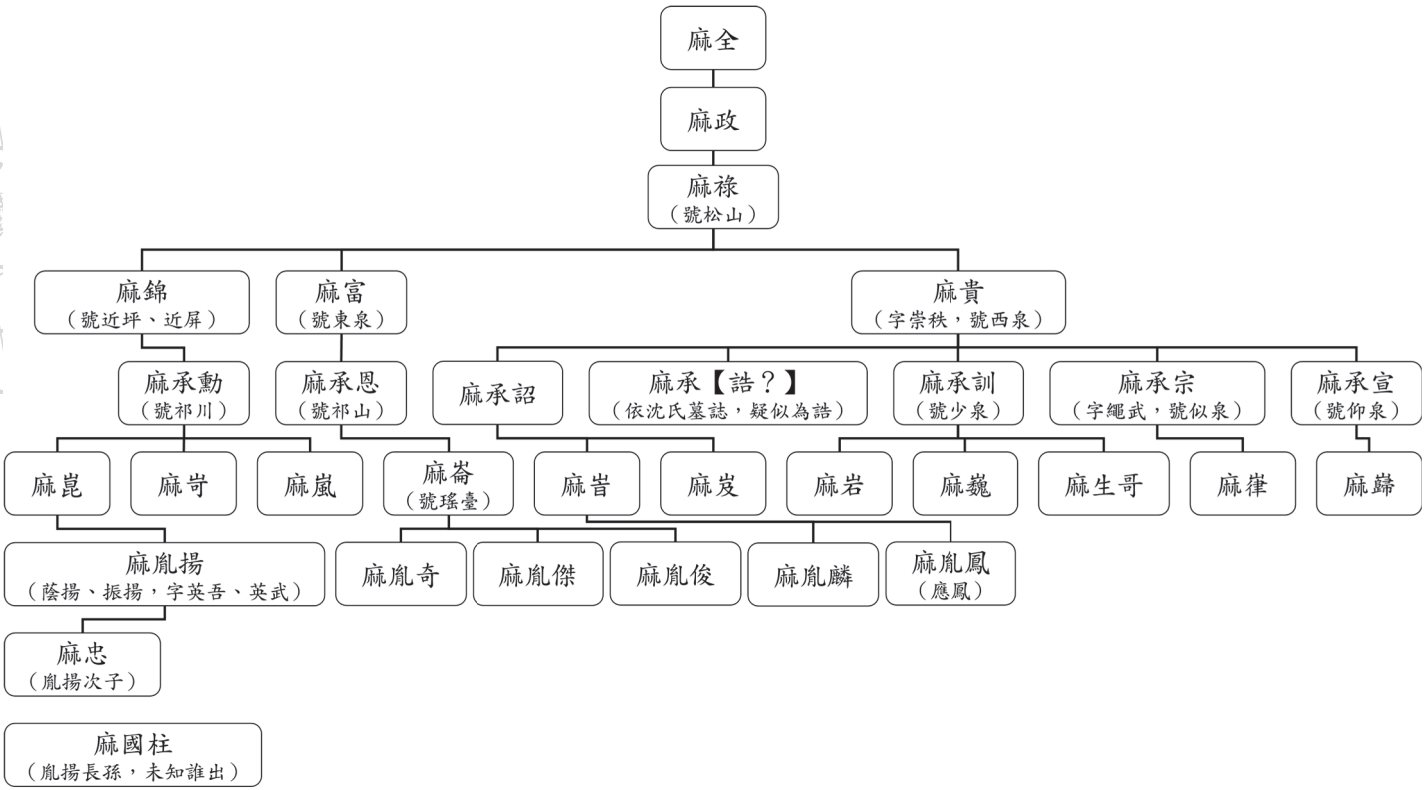
28 《正德十二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方芳等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中冊（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頁 303。

29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第 7 冊，頁 56。

30 參李大鈞、李大宏，〈山西大同右玉麻氏家世與碑銘〉，頁 891–899；紀海龍，〈麻貴軍旅行實考析〉，頁 47–52。

31 包含如下碑刻：《麻氏家族碑刻群》；〈沈氏墓誌銘〉，收入《右玉文史資料》第 24 輯，頁 118–119；〈尹氏墓誌銘〉，頁 123–124；〈麻續先墓碑〉，收入《右玉文史資料》第 24 輯，頁 126–127；〈明威將軍范君墓誌銘〉（右玉：右玉縣博物館藏）；〈馬母師氏合葬墓誌〉（蔚縣：蔚縣博物館藏）。

臺灣人文學期刊資料庫




圖一　麻氏家族世系圖

資料來源：《麻氏家族碑刻群》、〈明威將軍范君墓誌銘〉、〈馬母師氏合葬墓誌〉。

## 二、隆、萬前期麻氏家族的崛起

麻家原是普通軍戶，雖在永樂間獲得低階世職，但其真正發跡，與麻祿密切相關。麻祿，號松山，為人「深謀多算」，且「像貌雄壯，敵人畏之」。[32]他早年曾任蔚州守備，[33]從中下層軍官做起，一路以「戰伐起家」，曾率諸子守衛大同右衛有功而名震邊陲。[34]嘉靖三十二年（1553）任宣府遊擊，[35]旋任參將，與李涞（1538–1602）等人在永安堡禦敵，因援兵不到而失利問罪。[36]尋獲起用，次年九月奉許鈞令，率卞實等家丁在走馬梁等處斬獲有功；[37]同年又任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麻祿因抗擊魏昂誘亂有功，得封都指揮使，旋因長子麻錦殺人被褫職逮問。嘉靖三十九年（1560）再以參將起用，在劉漢帳下攻打豐州板升，得獲陞賞。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由威遠參將調陞宣府副總兵，後因事革職。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新設大同新平堡參將，又被起用。[38]上任不久，即擒斬王惡大等人，

32 劉士銘修，王靄纂，雍正《朔平府志》，卷 10，〈人物〉，頁 25b。

33 來臨，崇禎《蔚州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第 1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據日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卷 2，頁 395。

34 〈麻富夫婦合葬墓誌〉。

35 欒尚約、孫世芳，嘉靖《宣府鎮志》（劍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卷 28，頁 41a。

36 《明世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402，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己酉條，頁 7040；卷 402，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辛酉條，頁 7044。

37 王忬，《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卷 9，〈奪獲戰馬夷器等疏〉，頁 16a–17b。

38 《明世宗實錄》，卷 458，嘉靖三十七年四月癸未條，頁 7744；卷 460，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壬午條，頁 7775；卷 486，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條，頁 8100–8101；卷 505，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壬寅條，頁 8335；卷 509，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己亥條，頁 8386；卷 590，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壬申條，頁 89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迅速立威。[39]隆慶二年（1568）去職。之後麻祿去向史籍闕載，從碑刻看，其殘存墓誌蓋言其為驃騎將軍，[40]乃明代正二品初授武散階；〈麻貴夫婦合葬墓誌〉中提到祿「官協守，僉贈一品」。[41]麻錦、麻貴後來顯貴超倫，皆得生封正一品右都督，因此麻祿所得的這一散官，很可能是父以子貴的追贈，其在世品階只是二品。

麻祿是麻家首位入仕並官至二品、協鎮一方的成員，為其子孫奠定良好政治基礎。但僅有此一代之功，並不足以達成累世勳業的著名將門。麻氏大為勃興，是基於麻祿子孫的赫赫戰績，尤其錦、貴、承恩三人，皆得捧帥印，鞏固了該家族的仕宦網絡，是麻氏崛起的核心人物。鑒於此，有必要將其放在明後期政治軍事史脈絡下展開析論，探究其興起歷程、原因，並借此稍窺明中後期武官政治生態之堂奧。

## （一）明中後期的邊境軍事危機與「以邊人任邊將」的趨勢

土木堡之變（1449）後，明軍在北部邊境的軍力大幅削弱，英國公張輔（1375–1449）、泰寧侯陳瀛（?–1449）等元戎宿將及大批將士戰死沙場，英宗（1427–1464，1436–1450、1457–1464 在位）本人也身陷大漠，朝野大亂，京師震動。舊有老將漸不敷用，新生將才又未成氣候，尤其京師親軍將官子弟鎮邊者，更是如此，正如弘治初陝西巡按吳裕（1443–1501）的觀察，「各邊將官於京衛推舉，多係膏粱之子，不可任用」，[42]明廷在邊將任用上，開始逐漸考慮邊鎮的在地武官。馬永（?–

39 《明穆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11，隆慶元年八月丙戌條，頁 297。祿也因此入祀新平堡三英祠，參胡元朗，乾隆《天鎮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頁 14b。

40 〈麻祿墓誌蓋〉，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

41 〈麻貴夫婦合葬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

42 《明孝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18，弘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乙酉條，頁 43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40）、梁震（1483–1539）、周尚文（1475–1549），乃至萬曆以後的遼東李氏、大同麻氏、宣府董氏、涼州達氏，都是這一背景下崛起的中下層軍戶出身邊將。

正德以來，至隆慶和議之前，明朝對蒙古基本採取固守與敵對的政策，表現在經濟層面為絕其封貢；而蒙古諸部落維生資源主要依賴中原農耕地區，故屢次南下掠奪，企圖以戰逼和，謀求互市。在明蒙對峙中，大同右衛曾遭圍困，城中彈盡糧絕，「羅雀掘鼠，酷似睢陽狀」，麻祿與諸子頑強相抗，「倡義效死，傾囷賑旅以奮士氣。虜見堅守如石，齧指宵遁，孤城璧完」，[43]居功至偉，稱名塞上。之後蒙古諸部與明朝邊軍屢有衝突，錦、貴兄弟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累獲戰功，不斷升職，由千總等底層軍官一直做到副總兵、參將等中高級職務，甚至錦因殺人被問罪，都以「塞上方用兵之時」為由，而被曲法赦免。[44]在這個歷史大變局中，麻家擁有藉由邊功積累軍事經驗、壯大家族勢力的進身之階。烜赫戰功帶來了獎賞封蔭，子孫入仕武職，從而使子孫後裔獲得「將選」資格，由世職進入邊防鎮戍武官序列，提供父子、兄弟、叔侄並肩共事、守望相助的契機。

而這一契機的出現，其實有著深刻的制度源頭：麻氏作為山後移民的回回族群，本質屬於明代達軍世襲職官，其在衛所體系架構中，基本上遵循邊鎮集中編伍、內地參錯以居的原則，相對聚居的環境，有助於保持騎射傳統，避免戰力弱化。[45]雖然大同右衛達官軍是否專設達營，尚闕史料，但可以從其他相鄰北部邊鎮的達官軍聚居模式作為參照：如明中後期將保定地區的衛所達官進行編伍，即達官軍演變而來的忠順營，[46]他們平時專心練武，戰時徵調重用，長期免除輪操、戍守和雜役，

43 〈麻貴夫婦合葬墓誌〉。

44 萬斯同，《明史稿》（寧波：寧波出版社，2008 據天一閣藏寫本影印），第 7 冊，〈麻貴傳〉，頁 25。

45 奇文瑛，《明代衛所歸附人研究——以遼東和京畿地區衛所達官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頁 49–51。

46 這批達官早期自西北塔灘蒙古遷入涼州、寧夏、莊浪一帶，逐步二次內遷進入保定、河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保存「敵愾之勇」。[47]推而類之，大同右衛麻氏回回武官的聚伍，即有其可能性。再有一個旁證，正德年間，麻政已經是大同右衛穆斯林社群德高望重的鄉老，參與經辦創建本衛清真寺，[48]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同信仰族群，很難出現這種公推鄉老、創修寺宇、經辦教務的現象，這也側面說明了右衛回回軍人的聚居情勢。

作為回回族群，信仰是其重要特徵。因回回軍戶集中駐防，加以高階回族武將的支持，駐防地修建多座宗教建物；宗教活動又增強了族群間的凝聚力，從而使其戰力不可小覷。麻氏、馬氏為代表的回族將門，其宗教熱忱對家門乃至族群的團結作用甚大，如兩家成員熱衷修繕清真寺，被贊為「禮天祝聖，默得那國之法教日振，母罕默德之靈異日彰，諸公誠禮孚格天人矣」，[49]帶動本宗族數十人乃至他姓軍戶穆斯林的修寺熱忱，使當地回教軍人族群更加緊密。此外，麻、馬兩家還在教胞、鄰省、共事的情感基礎上，通過聯姻進一步結成共同體，互相提攜姻親中的年輕人：如馬林（?–1619）三子炯隨麻貴前往朝鮮立功，從舍餘之身連擢小旗、實授百戶；[50]再如遼事時，麻岩隨馬林進攻開原。[51]這種宗教加親緣的雙重凝聚，培養了新生力量，也鞏固了將門根基。

而且，明中期以後鎮戍營伍制度興起，邊將多選土著，時人謂「邊

---

間、定州諸衛。參周松，〈從西蒙古草原到華北平原：明朝忠順營源流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 年第 2 期，頁 39–49。

47 彭勇，〈論明代忠順營官軍的命運變遷〉，《中州學刊》2009 年第 6 期，頁 183–185；彭勇，《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8–142。

48 〈崇禎元年重修右衛禮拜寺碑記〉。

49 〈天啟二年重修禮拜寺碑記有銘〉。

50 《蔚州衛選簿》，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70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影印），頁 332–333。

51 《明神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579，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乙亥條，頁 109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必用本土之人，庶知彼兵勢地利，易於成功」。[52]這種「北將用北，南將用南」的趨勢，結合北邊衛所達官的聚居性，共同孕育了麻氏這一邊境回回將門的發端。作為山後達官，他們既在衛所世職上父子傳承，早有根底；作為鎮戍制度下的邊將，他們又能以將門將種、在地人解在地事的名義接續任職，成員在仕履上重合性甚大，乃至兄弟、父子接連就任同一營伍職務，在地利、人和上占盡先機。以麻氏為例，成員往往連續幾代在相同防區甚至家鄉鎮守，如祿、貴、承詔、承訓均曾擔任新平堡參將，尤其是麻貴接替父親續任新平堡參將，[53]開啟該家族父子連續經營同一戍區的局面（參表二）。

再如麻錦任大同副總兵時，[54]其弟貴任大同參將；[55]錦萬曆三年（1575）甫由大同調往甘肅，[56]貴不久亦調任大同副總兵。貴自萬曆五年至十九年（1577–1591）任職大同副總兵、總兵，中間雖有部議欲將之調往寧夏，然終「未果」，[57]使他連續十四載未離大同，即便被彈劾回衛，仍然居於本鎮。期間其子侄輩承恩、承勳也先後在大同擔任參將、守備。[58]承恩後來更完成「四捧元戎之轂，與伯叔先後鼎峙其榮」的光耀。[59]總之，其族威名雄勢，不僅讓右衛為麻錦、麻貴建起「兄弟將

52 《明憲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234，成化十八年十一月癸丑條，頁 3984。

53 《明穆宗實錄》，卷 19，隆慶二年四月丙戌條，頁 525。

54 左熙，〈重修威遠衛城垣記〉，收入劉士銘修，王靄纂，雍正《朔平府志》，卷 12，〈藝文〉，頁 79a–80b。

55 〈萬曆三年敗胡堡「永寧」石匾〉。

56 萬斯同，《明史稿》，第 7 冊，〈麻貴傳〉，頁 25。

57 〈麻貴夫婦合葬墓誌〉。

58 承恩任職紀錄可參《明神宗實錄》，卷 94，萬曆七年十二月戊寅條，頁 1904；承勳任職紀錄可參沈涵，〈虜情漸改邊事可虞疏〉，收入張鹵編，《皇明嘉隆疏鈔》，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7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據明刻本影印），卷 16，頁 262–263。

59 〈麻富夫婦合葬墓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帥坊」、「四世一品坊」、「都督坊」等牌坊，[60]鄰近的大同府城也為祿、錦、貴、承恩、承勳起造「祖孫父子兄弟元戎坊」。[61]大同鎮之於麻氏，既是故鄉又是任所，益發使之深植本土，養成樹大根深、難以撼動的地位。

表二　麻氏主要有職務者仕履表

| 代數 | 麻氏成員 | 與上代人關係 | 歷任主要官職 |
|---|---|---|---|
| 1 | 祿 | 政子 | 蔚州守備、參將、萬全都指揮僉事、萬全都指揮使、威遠參將、宣府副總兵、新平堡參將 |
| 2 | 錦 | 祿長子 | 宣府遊擊將軍、大同平虜參將、大同副總兵、山西總兵、宣府總兵 |
| 2 | 富 | 祿次子 | 大同右衛指揮僉事 |
| 2 | 貴 | 祿幼子 | 赤城守備、新開口守備、宣府入衛游擊、新平堡參將、宣府獨石參將、宣府副總兵、大同副總兵、大同總兵、禦倭提督、遼東總兵 |
| 3 | 承勳 | 錦長子 | 柳溝城守備、新平堡守備、萬全都司軍政僉書、大同入衛遊擊、獨石參將、五軍營右副將、薊西副總兵、寧遠參將、副總兵管延撫標下游擊、紫荊關參將、紫荊關副總兵、南京後府僉書 |
| 3 | 承恩 | 富獨子 | 永嘉堡守備、瓦窯口守備、大同入衛遊擊、井坪參將、利民堡參將、河曲參將、山西副總兵、薊東副總兵、昌平總兵、宣府總兵、延綏總兵、大同總兵、原官戴罪援遼 |
| 3 | 承詔 | 貴長子 | 密雲遊擊、獨石參將、寧夏北路平虜參將 |
| 3 | 承訓 | 貴次子 | 大同守備、真定遊擊、臺頭營參將、宣府上北路左參將、薊東副總兵、署新平堡參將、燕河路參將、薊東副總兵 |
| 3 | 承宗 | 貴三子 | 大同右衛指揮同知、新河口守備、岢嵐守備、水泉營守備、新平守備、廣寧備禦、杏山備禦、正安堡遊擊、高平遊擊、遼撫標下中軍、義州參將、遼東副總兵 |
| 3 | 承宣 | 貴四子 | 鎮門堡守備、大同入衛遊擊、延綏參將、洮岷副總兵、孤山副總兵、援遼副總兵 |

60 劉士銘修，王靄纂，雍正《朔平府志》，卷 4，〈建置〉，頁 90ab。

61 胡文燁等纂修，許殿璽、馬文忠點校，順治《雲中郡志》（大同：大同市地方志辦公室，1988），卷 3，〈建置志〉，頁 10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代數 | 麻氏成員 | 與上代人關係 | 歷任主要官職 |
|---|---|---|---|
| 4 | 崑 | 承勳長子 | 波羅堡守備、密雲督標遊擊 |
| 4 | 苛 | 承勳次子 | 守備 |
| 4 | 崙 | 承恩獨子 | 守口堡守備、山西遊擊、援遼遊擊 |
| 4 | 岩 | 承詔長子 | 殺胡口守備、神機十營佐擊、遼東強兵營遊擊 |
| 4 | 岌 | 承詔次子 | 雲陽堡操守、殺胡口守備 |
| 4 | 岩 | 承訓長子 | 大同右衛指揮僉事、遼撫標下中軍、開原副總兵管鐵嶺遊擊事 |
| 4 | 巍 | 承訓次子 | 大同右衛指揮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麻氏家族碑刻群》。

由於麻氏家族成員長期深耕邊鎮，徵調區域多在九邊一帶輪防鎮戍，且多屬就近陞轉，所以即便調任到其他邊鎮，父子、叔侄、兄弟之間往往仍能互相照應、積累經驗。如麻錦任宣府總兵時期，其子承勳任宣府獨石參將，防邊修城，「父子戮力，虜畏軍懷」，[62]承勳還自豪地在宣府捨身崖鐫下三代名姓，以紀念祖父、父、叔與自己先後或同時任職宣府；[63]不久承詔、承訓亦任獨石參將，且相距時間極短。[64]再如萬曆五年到八年（1577–1580）錦任山西總兵，[65]數年後承恩任山西副總兵，「勇略益彰於西鄙」；[66]不久承勳亦任此職，「聲震虜中，功高塞上」，兄弟皆得撫臣力薦。[67]又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麻貴拜延綏總兵，

62 張佳胤，《居來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1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48，〈建修獨石三城碑〉，頁 545。

63 〈萬曆十年麻氏三輩刻石〉（赤城：赤城縣雲州鄉龍門摩崖）。

64 承詔任職紀錄可參《明神宗實錄》，卷 191，萬曆十五年十月辛酉條，頁 3579；承訓任職紀錄可參李化龍，《撫遼疏稿》，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6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1，〈西協禦虜功罪疏〉，頁 22。

65 姜際龍，《新續宣府志》，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地方志珍本叢刊》第 18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據清初鈔本影印），頁 361。

66 沈子木，《督撫三晉疏鈔》（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後期刊本），卷 4，〈遵例薦舉武職官員疏〉，頁 18b。

67 喬璧星，《喬中丞奏議》（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卷 3，〈舉剌將

臺灣人學博碩期刊資料庫

承勳二十四年（1596）亦調來延綏，[68]與叔父得以再次共事，承恩則在二十八年（1600）調延綏總兵。[69]這種持續的仕履耕耘，有效蔭庇家族後續出仕者，進而構成綿密的軍事世族網絡。

麻氏家族輪防鎮戍的「信地」，受到國家制度影響甚鉅。如明中後期的達官軍、忠順官軍，作為入衛官軍，在北邊原京操班軍大量撤回本地的情形下，與其他邊鎮軍兵抽調輪戍，參與京畿的日常防禦體系。[70]推而及之，以麻氏為代表的近畿衛所回回軍人，當亦不能免除。在明後期的九邊輪防中，由於北部邊事日趨緊張，防禦體系由北京城防為主，逐漸推擴到京畿防禦、九邊輪防，達官軍職責已經逐漸與其他軍戶、募兵、民兵無實質區別，[71]麻氏可能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與其他邊鎮將門一樣，融入九邊輪防的體制當中。

## （二）征戰與搗巢：積蓄家族資本的重要途徑

將門興起，最基礎的根源是軍功，無戰爭則無軍功可言，因此麻氏凡逢作戰，往往家族齊聚，甚至攜帶年幼成員出戰，俾名登功簿。而麻家出征的方式，體現出明後期邊將家族全家出戰的特點。如麻貴攜罷官在家的長子承詔西征寧夏，使其立功復官，族人麻植、麻允孝等也隨軍征討，均得優敘；[72]再如貴鎮延綏，次子承訓以舍餘從征，不久便得世職；又如麻貴東征朝鮮時，以親家沈棟為隨營聽用參將，族弟麻蓁為旗鼓千總，親族麻寵和幼孫麻岩為旗鼓把總，親屬麻植、麻任、麻廷臣、麻承誥及麻承志為紅旗把總，皆自置於標下隨扈，置於別營者尚有千總

領疏略〉，頁 53a。

68 《明神宗實錄》，卷 299，萬曆二十四年七月戊子條，頁 5609。

69 《明神宗實錄》，卷 350，萬曆二十八年八月甲戌條，頁 6558。

70 彭勇，〈論明代忠順營官軍的命運變遷〉，頁 185。

71 彭勇，〈論明代忠順營官軍的命運變遷〉，頁 184–187。

72 梅國楨，《西征集》（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末刊本），卷 2，〈第十二疏〉，頁 20b–23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麻雲、麻渠、麻補，他們均得記功推補，陣亡者也得到了兩級陞蔭。[73]直至遼東戰爭時，承恩還自稱與「弟、侄共受征遼之任，調到諸將半係舊屬之僚」，[74]在待罪時也被特許「帶領子、侄、家丁立功自贖」。[75]每遇戰陣，「秉鉞登壇，侄與子弟」，是麻氏得立功勳的重要保障。[76]

戰爭可陞官晉爵、封妻蔭子，更可藉此獲得戰馬、人口、器械等大量資本。因此某種程度上，明蒙之間戰爭的頻率與規模，影響邊鎮將門的功次累積與利益經營。職是之故，明後期九邊將領時常主動「搗巢」，一旦局勢有所緩和，便可能心生異議。如明廷與俺答汗（1508–1582，1571–1582 在位）隆慶和議之時，宣府、大同的將帥對此頗有不滿，宣大總督王崇古（1515–1588）批判這群將帥「不遂私圖，敢撓公議」，「陰伺凌擠」，「賣直沽勇」。[77]與俺答汗交涉的明使也說：「如今我們各鎮軍丁因太師（王崇古）准了你們進貢，恐怕斷了他們搗巢趕馬的利路，俱各懇告不要容貢，惹得我們太師惱了，責治了幾個。」[78]張居正（1525–1582）去信崇古，亦言封貢一事大同總兵馬芳（1518–1581）「最不願聞」，崇古雖對芳「以法繩之」，但需提防其「積恨生變」。[79]邊將借搗巢積功獲馬一事之普遍，麻氏亦概莫能外，僅萬曆二十三年（1595）內，麻貴在延綏邊外提兵深入搗巢，不僅斬獲 230 首級，還奪取牲畜超過 15,000

73 姜良棟，《東征錄》（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卷 3，〈大敘平倭功疏略八〉，頁 44a–46a。

74 麻承恩，〈乞覈守援真情疏〉，收入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12，頁 438。

75 熊廷弼著，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卷 7，〈前經略奏疏第一・事急缺人疏〉，頁 363。

76 張佳胤，《居來山房集》，文集卷 64，〈祭麻將軍文〉，頁 719。

77 王崇古著，張志江點校，《少保鑒川王公督撫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卷 8，〈酌議貢市未妥事宜疏〉，頁 258。

78 〈為再奉明旨條議北虜乞封通貢事宜以遵國體以昭威信事〉，收入《兵部奏疏》（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7 據北京國圖明鈔本影印），頁 281。其中被責治者有馬芳、趙岢，參特木勒，〈將帥家丁與明蒙關係：前近代內亞遊牧農耕關係重審〉，《清華元史》2015 年第 3 期，頁 393。

79 張居正著，吳量愷等點校，《張居正集》（武漢：荊楚書社，1987），卷 15，〈與王鑒川計四事四要〉，頁 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頭／匹；[80]麻貴所「滅獲頭畜」，往往由其妻沈氏親自打理，井井有條，「罔論洪纖，恰合肖付，無一舛錯」，被譽為「慷慨有丈夫風」、「女中之傑」，[81]從而積累起雄厚的家業。

再如承恩任老營副將時，「按伏衝地，夜襲虜寨」，宰生倘不浪、黃鵝兒諸部皆呼「麻副參兵強，無輕犯也」；[82]他陞任昌平總兵後，屢欲「出搗巢穴，招來板升」，兩度被首輔申時行（1535–1614）寫信勸阻。[83]這種武力不僅施於敵對的蒙古諸部，內附「屬夷」也受影響：承詔任宣府北路參將時，令家丁搶奪史部（朵顏別部）馬匹，扣押該部例行賞糧，[84]「侵牟其犒賞，占奪其牧地，剽掠其善馬」，並納其女子為婢妾，收其人員為傔屬，[85]因此革任回衛。

隆慶和議後，明廷對蒙政策由戰轉撫，提倡北邊諸將「要禦侮，莫啟釁」，「搗巢」、「雕剿」多被視為「啟釁」之根，[86]因此搗巢頻率較以往下降，互市下的官私貿易成為利源，如麻貴、麻岌兄弟曾任殺胡口守備，直接督理該口馬市；族人麻秦則從邊外招募「真夷」、走私「夷馬」及黃鼠、狐皮等。[87]總之，明後期邊鎮將門普遍通過「搗巢」搶掠

80 《明神宗實錄》，卷 284，萬曆二十三年四月辛酉條，頁 5260；卷 285，萬曆二十三年五月乙未條，頁 5288。

81 〈沈氏墓誌銘〉，頁 118。

82 張貞觀，《掖垣疏草》（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1，〈乞賜議處孤鎮新舊將領疏〉，頁 1b。

83 申時行，《綸扉簡牘》，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16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刻本影印），卷 9，〈答麻總兵〉，頁 372；卷 9，〈答麻總兵承恩〉，頁 377。

84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3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萬曆刊本影印），卷 1，〈史二官車達雞列傳〉，頁 119。

85 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末薛氏青雷山館鈔本），卷 1，〈論錦衣邊將疏〉，頁 25a–25b。

86 朱正色，《自敘紀事》（邢臺：南和朱氏家族藏明後期抄本），第 2 冊，〈萬曆十三年五月紀事〉，頁 17。

87 《明熹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81，天啟七年二月戊戌朔條，頁 3908；楊時寧，《總督宣大山西軍門奏議》，卷 5，〈題為遵例年終舉

臺灣人學博碩期刊資料庫

以及官私貿易等手段，蓄養人丁、軍馬等戰略物資，積累豐厚資本。如麻貴因私賣官馬、人口，唯恐受到追責，遂以數萬財寶賄賂太監田義；[88]又如麻承恩以蓄良馬眾多，而朝野盡知。[89]凡此皆可見邊將家族雄厚的經濟實力。

## （三）家丁：明後期邊鎮將門戰力的精銳

將門依靠累積數世的健勇家丁，衝鋒陷陣，所向披靡，時人沈德符（1578–1642）曾言：「今西北將帥所蓄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90]方逢時（1522–1596）亦云：「或扣官餉，或捐私財。召募勇壯，優加恩養。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名為家丁。扼虜衝鋒，幸功逭罪。」[91]如前人研究，邊將家丁的經濟基礎來源為朝廷撥發俸祿、養廉田、賞賜等官方款項，以及搗巢趕馬帶來的各種財政收益。[92]惜宏論多而微觀少，家丁在具體案例裡的運行實態，仍有探索空間。如麻家屢立奇功的原因，除了錦、貴等成員自身驍勇善戰，家丁健兒也貢獻甚大。麻貴參與的寧夏、朝鮮之役，部下蒼頭都立功赫赫，他得獲起用平定哱拜，便是兵部認為其素來驍勇且家丁眾多之故。[93]總之，

---

刺武職官員事〉，頁 14a–15b。

88 鍾羽正著，劉序勤等點校，《崇雅堂集》（青州：青州古籍文獻編委會，2008），卷 8，〈乞賜斧斷以破神奸疏〉，頁 130。

89 《明神宗實錄》，卷 583，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丙子條，頁 11107。

9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補遺卷 3，〈家丁〉，頁 871。

91 方逢時撰，李勤璞校注，《大隱樓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卷末補遺，〈審時宜酌群議陳要實疏〉，頁 311–312。

92 肖許，〈明代將帥家丁的興衰及其影響〉，《南開史學》1984 年第 1 期，頁 102–122；馬楚堅，《明代的家丁》（宜蘭：明史研究小組，1985）；趙中男，〈論明代軍事家丁制度的歷史地位〉，《中國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頁 158–166 等等。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21）探討家丁的軍前報效、食雙糧等問題，值得重視。

93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1，〈哱拜哱承恩列傳〉，頁 13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貴「係西人」，「必用西兵為家丁」，「若不帶家丁，則無手足」，[94]家丁之功，於此可見。承恩「尤愛健兒、良馬」，「即空橐裝不惜」，甚至母親王氏亦鬻賣首飾助資；[95]任河曲參將時，「以忠勇自負」，「畜健兒，越邊地射獵」，聲威遂立，虜寇「不敢犯」。[96]朝鮮之役時，遼東「諸酋屯聚邊外」，承勳與世交馬林皆因「幕下多敢死之士、慣戰之馬」，所以巡撫李植（1552–?）推薦二人各帶三千家丁馳赴。[97]承訓自帶健壯家丁「鼓刀兒數十輩」，隨父戍守延綏，奮勇立功，不到兩年，迅速由無世職的衛所舍人陞為所鎮撫。[98]

麻家相當重視家丁的恩養與保障。貴妻沈氏對這些家族軍卒、蒼頭童僕中「弱且老者」、「病且殘者」，親自存撫救濟，被譽為「佛大士」；[99]承恩曾捐資招募健兒，「所得死士以千計」，其妻尹氏負責照顧「諸健兒之婦」，「死者恤之，疾者問之」，全力安撫照顧家丁們的妻兒老小，甚至每逢「歲時伏臘」，都特意宴請家丁們的家眷，「宴犒盡歡」，種種物質及精神上的照顧，使得家丁健兒減少後顧之憂，更能拼死奮戰。家丁們有過錯時，承恩嚴以軍令約束，尹氏為之寬恕「庇露」，一者「不廢法」，二來「不廢恩」，承恩夫婦由此亦被家丁們稱為「男平原」、「女孟嘗」，麻家出現「一時鼓刀兒疇（莫）不願為效死」的局面，承恩亦藉此「威名大張，勳級累累」。[100]

以麻氏為代表的邊將家丁中最難忽視的力量，就是前人研究中關注不多的「夷丁」。夷丁多出自蒙古部落，少善弓馬，性氣剽勇，又熟悉

94 沈一貫，《敬事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5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刊本影印），卷 9，〈再催遼帥及言罷斥多官揭帖〉，頁 237。

95 〈麻富夫婦合葬墓誌〉。

96 曹春曉纂修，道光《河曲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卷 2，頁 23b。

97 李植，《言事紀略》（東京：前田育德會藏明萬曆刻本），卷 3，〈題為地方危急萬分難支等事〉，頁 4a。

98 〈麻承訓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

99 〈沈氏墓誌銘〉，頁 118。

100 〈尹氏墓誌銘〉，頁 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族事務，更有助於邊將在明蒙戰爭中獲勝立功，以致出現「各鎮將官，多招募降夷以充家丁」的局面。[101]他們遠離故土，處在軍營之中，語言、習俗皆難融入，唯一可以依托的就是作為家主的將官，其人身依附性比衛所軍士轉換的家丁強，往往更能拼死效力，甚至不乏出現將才。正如李成梁（1526–1615）家夷丁李平胡、李寧皆成將帥那樣，麻家夷丁中也有陞職較高者：如擺賽，隨麻貴征寧夏、朝鮮，一路拼殺立功，最後馬革裹屍，贈副總兵銜。[102]麻氏對夷丁如臂使指，是助其立功累巨、百戰標奇的重要力量。

在「洪、永以後，虜患日棘，大將之設遂成常員，鎮守權重，都統勢輕」的情形下，九邊的「衛所精銳」被「悉從抽選」，於是「正、奇、參、守之官設，而衛所徒存老家之名」，歷年既久，一旦大將不得其人，訓練失當，軍律舛謬，便生「士馬之死亡者不補，逃散者不復，尺籍徒存，部曲虛耗」之弊，[103]從而使衛所兵戰力進一步下降。如麻貴任大同總兵時，便長期「採青剝軍、占地盜糧」，[104]如此情形下，邊將逐漸難以只憑衛所軍兵衝鋒陷陣，而不得不借重制度外的家丁。麻家對夷漢家丁的仰重，是明後期衛所軍制廢弛導致的惡果，凌虐軍士、侵扣軍餉的惡劣積習，也使得衛所軍制進一步崩頹。不僅麻氏，蔚州馬氏、宣府董氏等亦一同冒軍領餉，「凡三歲糜宣大兩鎮七千七百七十餘石」，皆遭勘罪。[105]麻氏家丁衣錦飫粱的來源，極可能是這些冒瀆貪墨的軍餉。此外，家丁不僅侵漁普通軍士權益，在對外作戰時，其歪風也作害不小，譬如萬曆朝鮮之役中，朝方就抗議「麻提督標下韃兵，尤甚作挐。托以討取馬草，散出閭巷，搶掠財產，刼奸婦女，遠近聞風竄走，環三四十

101 《明神宗實錄》，卷 6，隆慶六年（未改元）十月條，頁 234。

102 邢玠，《經略禦倭奏議》，收入《禦倭史料匯編》第 4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 據明刻本影印），卷 4，〈題擺遊擊恤典疏〉，頁 304。

103 方逢時撰，李勤璞校注，《大隱樓集》，卷末補遺，〈審時宜酌群議陳要實疏〉，頁 311。

104 《明神宗實錄》，卷 240，萬曆十九年九月丁丑條，頁 4466。

105 《明神宗實錄》，卷 462，萬曆三十七年九月壬寅條，頁 8723。

臺灣人學與知識加值資料庫

里，人家一空，所見極為駭慘」。[106]

邊將家丁在明後期的出現，有其制度和時代根源。明代在防止武將擁兵自重的同時，也削弱了主將與軍士之間的情感紐帶，導致士氣不高，戰力也因而下降，再加上操練普遍不足，是故主將仍需一支精養精操之兵，帶動整個平庸的衛所兵群體。且明廷也吸取了前代私兵的教訓，嘗試把家丁納入朝廷經制，大部分家丁的實質薪餉主要來源還是朝廷，[107]時人曾言「將門之有家丁，雖其爪牙腹心，而實公車公徒之屬，非樹私兵也」，[108]即有官私雙重屬性。且家丁人數多則千計，少則數百，和唐五代動輒成千上萬、作威作福的親軍牙兵無法相比。

## （四）明後期邊鎮將門的交結

邊將因遠離廟堂，訊息不便，政治嗅覺難免失靈，所以熱衷交結朝臣，以便趨利避害、維持仕途榮光。如承恩任職延綏時，欲調回鄉，經兵部尚書田樂（1541–1621）奏請，得調任大同總兵，[109]此事後來被查出麻家曾私下打點田樂。[110]不但麻氏如此，李成梁家族亦然，成梁先依張居正，居正倒臺後，又與申時行、許國（1527–1596）相善，申、許二人還因此被言官彈劾「曲庇」成梁。[111]再如戚繼光（1528–1588），與兵部侍郎汪道昆（1525–1593）是「生死交」。[112]廷臣在「廟堂之中」，邊將處「江湖之遠」，後者如想瞭解朝廷動向，需結交前者以作保障。

106 《朝鮮宣祖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據太白山史庫本影印），卷 97，宣祖三十一年二月二日丁巳條，頁 375。

107 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59。

108 鄭汝璧等修，馬希龍等纂，馬少甫等點校，萬曆《延綏鎮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點校本），卷 3，〈軍政〉，頁 150。

109 《明神宗實錄》，卷 370，萬曆三十年三月庚寅條，頁 6944。

110 周永春輯，《絲綸錄》，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7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卷 4，頁 686。

111 《明神宗實錄》，卷 238，萬曆十九年七月癸酉條，頁 4409。

11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卷 3，〈戚帥懼內〉，頁 86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邊鎮將門不僅交結廷臣作為朝中憑依，在邊鎮任職的督撫按道等文官，也是與其前途利害直接相關的群體。明中期以後，武臣「不由撫、按推薦，鮮得陞遷」，[113]總督統領數鎮，文武皆受節制；巡撫與總兵共同統兵並掌管錢糧，且監管總兵。督撫等文官兼具行政、軍事、監察、司法等權限，是將領們的上司；巡按「代天巡狩」，也發揮監察風憲的作用。與督撫、按臣等文官保持良好關係，是明中後期邊將必行之事，將門也能由此獲得保障。以麻氏為例，麻錦任宣府總兵時，與巡撫張佳胤（1527–1588）緊密配合，衛邊有勞。[114]但錦因性格暴戾等諸多問題，多受物議，「頗不理於口」，佳胤頗護之，欲使其收斂，少受譏詆，為此還與閣臣申時行通信討論。[115]佳胤調往浙江以後，麻錦失去屏障，彈章連篇累牘，[116]終被御史陳性學（1546–1613）以「貪淫酷暴」之罪彈劾革任，[117]旋即病逝。佳胤遠方聞訊，對這個「唯我知爾、以發心事」的下屬甚感痛悼，專門作文遙祭，言辭誠摯，悔稱自己調任後無人忠告、約束「性率擊鷙」的麻錦，使之終被「虎成三言、百口奚贖」，而鬱鬱以終。[118]某種程度上，佳胤實錦之恩主。

再如承恩之仕途，王象乾（1546–1630）頗效劬勞。早年象乾還只是口北道時，便曾向山東巡撫孫鑛（1543–1613）力薦承恩。[119]即使後來承恩賄案纏身、「會勘七年，抗匿不結」，象乾仍想以「開原日急，聞承

113 楊一清著，唐景紳、謝玉傑點校，《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點校本），卷 3，〈為應制陳言修省以回天意疏〉，頁 808。

114 鄭洛，《鄭襄敏公赤牘》（濟南：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3，〈與政府〉，頁 16a。

115 申時行，《綸扉簡牘》，卷 1，〈答張崐崍巡撫〉，頁 25。

116 黃道瞻，〈兵政重寄酌處南北當事大臣疏〉，收入吳亮輯，《萬曆疏鈔》，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5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三十七年〔1607〕刻本影印），卷 19，頁 83。

117 《明神宗實錄》，卷 137，萬曆十一年五月丙午條，頁 2565。

118 張佳胤，《居來山房集》，文集卷 64，〈祭麻將軍文〉，頁 719。

119 孫鑛，《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 3 輯第 91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5 據清嘉慶重刻本影印），卷 4，〈與王霽宇觀察書〉，頁 193。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恩曾經戰陣，熟識虜情」等理由將其推薦起用。[120]宣大巡按吳亮（1562–1624）多次上疏，想重處久不招供的承恩，最後象乾到兵部上下活動，且親自致書吳亮，語重心長，「臺翰鄭重」，並請兵部職方徐鑾（?–1614）、宣大總督馬鳴鑾（1548–1610）出面緩頰，曉以利害，吳亮才答應放其一馬。[121]承恩與象乾在邊鎮「相輔車者裘葛凡六更」，「政無鉅細，悉鼎賴焉」，二人「臭味芝蘭，即一家一身事，亦露肝膽於樽俎間」，即便各自調往延綏、川貴時，亦通過蒼頭頻傳緘素。承恩喪母後，還千里迢迢專程遣人敦請象乾撰寫墓誌，[122]二者交情堪稱水乳。

明中後期雖存在以文抑武的形勢，但將門如果發展到權勢烜赫的地步，有時也會出現跋扈自雄的現象。如麻承恩在宣府任總兵時，與右布政孫維城（1540–1602）不和，承恩「故驕橫，善乾沒」，「世家也，力鉅而有內主」，維城「常以法繩其部」，承恩「（中）傷之」，「倚奧援傾」維城，欲使其改任廣東左布政，「邊吏內轉，於法為詘，鎮人大譁」，督撫上書留之，方得改山西。[123]不久承恩移鎮延綏，次年維城亦巡撫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命餘丁除之，承恩紿其眾曰：『塞沙可盡乎？』卒遂譟。維城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但最後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124]承恩則如願回鄉掛印拜帥。在此事件中，可見承恩一派倚援自傲、鼓譁生事的驕將之姿。直到思宗末期，文人劉城（?–1649）仍回憶「昔日東李西麻之橫」，認為邊將家族把邊鎮「視之猶閭里故舊」，

120 《明神宗實錄》，卷 463，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壬申條，頁 8742。

121 吳亮，《止園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卷 10，〈道臣曲庇罪弁疏〉，頁 19b–20b；卷 23，〈與徐職方耀玉〉，頁 8ab、11b；卷 23，〈答馬鳳麓〉，頁 10a；卷 23，〈答薊遼王制臺霽宇〉，頁 10b–11a。從以上紀錄，結合承恩最後仍被起用的結果來看，吳亮遵守承諾，沒有繼續抓住承恩抗結一事不放，參徐鑾，《職方疏草》（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刻本），卷 10，〈覆宣大巡按條陳十議疏〉，頁 1a–8a。

122 〈麻富夫婦合葬墓誌〉。

123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4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據明萬曆平陰于緯刻本影印），卷 23，〈衛宇孫公墓誌銘〉，頁 663。

124 張廷玉，《明史》，卷 227，〈孫維城傳〉，頁 5966–5967。

臺灣人學藝術圖書資料庫

長期紮根經營，有本土優勢；又與蒙古「馬蹄絡繹，聲息時通，厚利甘言，往來不絕」，使得「其物力則猗頓、陶朱也」，打下厚實經濟基礎；其位階崇高，連家丁、義子都「拖曳金紫、布列偏裨」，[125]加之交結奧援，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之下，最終形成勢雄力大的邊鎮將門。

## 三、萬曆中期以後麻氏家族的沒落

麻氏興起於麻祿父子的發跡，而第三代承字輩接武其父祖，在萬曆朝前期鼎盛一時：承勳、承恩、承詔等人或立功絕域，或鎮守一方，三代至此，勳閥漸顯，「隆、萬間，所稱邊城世將，自寧遠而外，即推麻氏矣」，「人以方鐵嶺李氏，曰東李西麻」。[126]然萬曆中期以後，伴隨著寧夏、朝鮮、遼東諸役進行，承詔英年被刺，承恩、承訓等人在官場失勢，屢屢被劾；承恩、承宣在遼事中的表現不佳更是令麻氏一蹶不振；相對年輕有為的承宗及麻岩戰歿沙場，使麻氏隨著國難與家難逐漸沒落，出現了「列戟擁麾，世傳將種，而恇怯退避，隳其家聲。語曰將門有將，諸人得無愧乎」的局面。[127]

### （一）黨爭、貪腐與債帥——晚明混亂政局下的麻氏將門

明代以文統武的體制導致武將熱衷於交結文官甚至內官，以便在面臨推陞、轉職、贖罪等仕途關卡時獲得照顧，但也容易因此陷入文臣之間的糾葛，被彈劾失勢。如麻貴任大同總兵時，被彈劾「虛冒營馬」，[128]「剝軍成家」，且「將王府女送與口外」，因「恐皇上拿解來京」，故「遣子麻承詔親齎金寶值銀數萬」送與太監田義。田義「使弟田鎔收騙

125 劉城，《嶧桐文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12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清光緒養雲山莊刻本影印），卷 4，〈制鎮將議〉，頁 430。

126 萬斯同，《明史稿》，第 7 冊，〈麻貴傳〉，頁 26。

127 張廷玉，《明史》，卷 238，〈麻貴傳〉，頁 6203。

128 《明神宗實錄》，卷 240，萬曆十九年九月丁丑條，頁 4466。

臺灣人事學會期刊資料庫

入已，假言赴部求與從輕覆本」，麻貴在大同自言：「我有田公力量，誰能害我？」此言「人人盡知」，[129]但最終還是為鍾羽正（1554–1637）等諫臣所劾，被罷職論戍。[130]再如田樂保舉承恩為大同總兵一事，[131]就迅速被御史張似渠以「鑽求」之罪上奏，似渠捕獲承訓的行賄家僕，送有司拷問，得出承恩、承訓逢迎時任本兵田樂的結論，案情還涉及承勳、承宗、貴婿張國將。這一系列政治鬥爭，使田樂提前致仕，[132]承恩則被多名科道官以「違禁餽遺」之罪交章相劾，最後被革回衛；[133]承訓也遭罷職，兄弟長期「角巾私第」、戴罪鄉居。[134]直至數年後京察時，麻氏賄案仍成為部分文臣互相攻訐的話柄，孫居相（1560–1634）以此案指稱承恩賄大學士沈一貫（1537–1615）銀五千兩，承勳（訓）賄萬兩，[135]斥其縱容納賄，奸貪植黨；一貫辯稱事涉田樂，與己無關，且法司早有定讞。[136]但最後一貫自請去職，居相亦奪祿一年。[137]

這些事件與人物其實彼此間早有是非轇轕，暗藏糾纏互繞的官場脈絡。如鍾羽正、孫居相等人是鯁諫清流，而沈一貫是「浙黨」魁首，利益及政見分野，某種程度已影響先行立場；田義雖曾與沈一貫在稅監問

129 鍾羽正，《崇雅堂集》，卷 8，〈乞賜斧斷以破神奸疏〉，頁 130。關於明代邊軍遭遇的研究，參邱仲麟，〈邊緣的底層：明代北邊守墩軍士的生涯與待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 第 3 期，頁 147–182、215–216。

130 《明神宗實錄》，卷 240，萬曆十九年九月乙酉條，頁 4474。

131 《明神宗實錄》，卷 370，萬曆三十年三月丁卯條，頁 6929；卷 370，萬曆三十年三月庚寅條，頁 6944。

132 周永春輯，《絲綸錄》，卷 4，頁 686。

133《明神宗實錄》，卷 376，萬曆三十年九月丙寅條，頁 7063。

134 〈麻承訓墓誌〉。墓誌將因賄革職諱為「中射工」、「遭讒去」。後承訓雖得短暫復出，又遽而病卒。

135 孫居相，《兩臺疏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卷 1，〈劾奸貪輔臣納賄植黨疏〉，頁 65b–66a。

136 沈一貫，《敬事草》，卷 19，〈無端汙蔑萬死難甘疏〉，頁 554；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萬曆三十四年，頁 2373–2378。

137 張廷玉，《明史》，卷 254，〈孫居相傳〉，頁 6558。

臺灣人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題上有過衝突，但私下仍有些利害關係與交誼；[138]麻貴賄賂田義一事，被鍾氏等清流用作指斥「奸惡內臣」、「弄權結黨」的舉證，表面是反對宦官弄權，實際劍指提線操作的皇帝；[139]對於田樂因麻案遭劾求退一事，沈一貫雖在孫居相彈劾時竭力撇清關係，但私下相當支持田樂，且曾向神宗（1563–1620，1572–1620 在位）極意開解，感歎田樂「命窮時蹇」，「難以展布」，「軍國大事可為寒心」，斥責劾樂的諫臣「意氣相吞，口吻相刃，廟堂之上，祗成聚訟」。二人皆為隆慶二年（1568）進士，早有同年之誼，田樂不管在部在邊，皆曾得沈一貫揄揚，謂其「忠貞不二，嚴潔如霜」，[140]卻被孫居相等清流斥為奸貪朋欺。自沈一貫以楚獄、妖書打擊政敵以來，雙方政爭愈加白熱膠著，[141]這爭劾沈一貫的行為，與閣部相爭中的一系列活動，表面是針對內閣、打擊浙楚諸黨，實際上意在神宗；這和鍾氏等人打擊田義時，名為除閹、實指君權如出一轍。[142]麻氏以邊將遠來交結，反而捲入朝廷政爭；另一方面，麻氏為代表的邊鎮將門，本就存在嚴重貪賄問題，為清流所貶斥，亦理所當然。

明前期衛所制度為主流軍制時，武官集團便已出現貪污虐卒的現象，不少人利用身分便利，搶奪下屬戰功，奴役士卒，剋扣錢糧，賄買職事，造成中期以後軍變逐漸激化。[143]到了明後期，邊將鑽刺問題更為

138 沈一貫，〈司禮監太監渭川田公墓誌銘〉，收入李昱等，《北京市石景山區歷代碑志選》（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頁 13。

139 田義是較為友善「清流」的宦官，在內臣中相對「貞介」有「大臣度」，力勸神宗勤政批閱，善待士人，還諫言撤銷礦稅監，險被「手刃」。參劉若愚著，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卷 5，頁 29–30；張廷玉，《明史》，卷 218，〈沈一貫傳〉，頁 5758。

140 沈一貫，《敬事草》，卷 11，〈言田本兵揭帖〉，頁 319；卷 6，〈乞搜播酋賄黨揭帖〉，頁 141。

141 小野和子著，李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309；楊向豔，《沈一貫執政與萬曆黨爭：以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 246。

142 鄧志峰，《王學與晚明師道復興運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頁 333–349。

143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頁 15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嚴重，偉功如李成梁都被數次彈劾逢迎朝臣。[144]至於麻氏活躍的宣府、大同地區，巡按吳允中（?–1623）就痛斥「武官鑽刺」，曰「宣大乃用武之地，雄才大略、可當一面之寄者固自有人，而狡獪闒茸寔繁有徒」，「倘奔競鑽求，書刺打點，轉托人情」，即便有才華也「應薦不薦」。[145]尤其是麻氏兄弟賄賂事發、下旨定案後，連與麻家關係友好的楊時寧（1539–1609）都與麻氏劃清界線：「今之武弁，鑽刺成風，頃因麻承訓等事覺，明旨森嚴，在內亦既惕然知省矣。然此輩不得鑽於內，必求鑽於外，內外一體嚴禁，庶幾病根可拔。」[146]這種鑽求奔競是邊將討好文官的真實寫照，其之所以發生，與明中後期文官逐漸掌握武官的考選之權及壓制武官密切相關。武官起黜陞陟的前途均在文臣手中，最終形成文尊武卑之局：[147]「內之部科，外之監軍、督撫，疊相彈壓，五軍府如贅疣，弁帥如走卒。」[148]神宗亦為此打抱不平，說文官們「平日把將官凌虐牽制，不得展布，有事卻纔用他」。[149]制度性矛盾導致邊將為了自身仕途與家族利益而討好文臣，甚至在被劾時嘗試援結內宦來充當保護。

文武間政治形態的不對等、權力的不平衡，是造成此現象的重要原因。而這也進一步誘使將帥們以賄為進，債帥橫行，不少武將「伎倆素拙于戰陣，而精神偏工於鑽營」，「平日以貸之素封子錢家者，輸之要津或中貴；而輸之要津、中貴者，償之部下之卒旅」，「上自大將、副將，下逮參、游、閫帥、備、總、千夫長、百夫長之屬，無

144 肖瑤，《李成梁與晚明遼東政局研究》，頁 44–59、160–170。

145 吳允中，《宣雲約法榜示》（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不分卷，頁 18b–19a。

146 楊時寧，《總督宣大山西軍門奏議》，卷 3，〈題為崇恬退抑奔競以塞鑽刺弊源事〉，頁 2b。

147 張祥明，《明代軍政考選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1），頁 222；陳寶良，〈明代的文武關係及其演變：基於制度、社會及思想史層面的考察〉，《安徽史學》2014 年第 2 期，頁 5–18。

148 張廷玉，《明史》，卷 90，〈兵志一〉，頁 2195。

149 《明神宗實錄》，卷 225，萬曆十八年七月乙丑條，頁 41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各有定價」。[150]越到後來，「太倉之金錢，日夜輦輸以給諸鎮武夫債帥，飽則颺去，徒益市良田美宅、歌兒舞女，自媮快而已。天下無事，處堂以嬉，猝有風雲之警，則耽耽疾呼，以求遂所欲，陵夷至神熹兩廟時，出入大不相當」，[151]形成豪商借貸債帥，債帥剝軍賄上，邊餉流向政府高官與有力宦官的利益輸送生態鏈。[152]邊餉本為解決邊務日急的問題，卻不能盡數敷用，愈加浪費；最後，邊事也從財政上益加敗壞，積重難返。

其實，明前期朝廷倚賴的邊將，往往是開國、靖難等在王朝初前期立功的勳貴舊臣及其子孫：如江陰侯吳高、武進伯朱冕（?–1449）鎮大同；西寧侯宋晟（?–1407）、宋琥父子鎮甘肅；寧遠侯何福（?–1410）、寧陽侯陳懋（1379–1463）鎮寧夏；武安侯鄭亨（1356–1434）鎮宣府，其孫鄭宏（?–1477）鎮遼東。然而，在土木堡之變後，勳貴軍權逐漸式微，成化以後「邊將多用本土之人」。[153]這些少小家居九邊、曉暢兵事的邊鎮衛所將門，在邊事叢擾、四郊多壘的背景下登上舞臺，他們大多出身寒苦軍戶，其背景、資本、基礎乃至於發展潛力遠遜勳貴。以其婚姻網絡為例，麻家在祿、貴、承恩的時代，往往只能和當地普通軍戶或低級世職聯姻；即便是麻氏兄弟官拜邊帥以後，聯姻對象最高是同為普通軍戶起家的邊將，偶見文官，也多半是鄰鄉，甚至是同為衛所軍籍的進士。[154]再如蔚州馬氏，也是與當地軍戶出身的武人祁氏以及大同麻氏聯姻，少數文官姻親也僅是同鄉的郝氏。[155]不談黔國公沐氏、英國公張

150 鄒維璉，《達觀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8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據吉林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影印），卷 18，〈請革債帥弊端疏〉，頁 217。

151 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畢際有刻本），卷 2，〈度支邊餉司奏議序〉，頁 18a。

152 谷口規矩雄，〈明末北邊防衛における「債帥」について〉，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 22。

153 《明憲宗實錄》，卷 234，成化十八年十一月癸丑條，頁 3984。

154 麻家婚姻情況，見右玉縣博物館藏《麻氏家族碑刻群》。

155 〈蘭溪馬公墓誌銘〉、〈馬母師氏合葬墓誌〉、〈兄樓祁公墓誌銘〉、〈遼東副總兵祁公墓誌銘〉，均係蔚縣博物館藏碑。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氏等傳統勳貴，即便對比恭順侯吳氏、會寧伯李氏這種早期率眾來歸的高級達官家族，[156]看似官拜高品的邊鎮衛所將門，其通婚網絡也略顯「寒酸」。這種似隱似現的玻璃天花板式阻隔，可見他們很難真正觸及勳貴及高級文官集團的核心。

## （二）遼東戰事對麻氏將門的打擊

麻家轉向衰落的標誌性事件是遼東戰爭。麻氏的人員力量、經濟狀況、政治地位，在戰敗過程及戰後清算時，遭受嚴重打擊。首先在人員力量上，主要成員麻承宗、麻岩等相繼犧牲。承宗於泰昌元年（1620）以遊擊身分攻打遼東，[157]旋任遼撫標下中軍，期間為軍糧運輸獻車牛，被當時負責閱視邊務的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1581–?）上本稱讚「慕義甚殷」。[158]天啟元年（1621）三月任義州參將，十月擢遼東副總兵，二年正月陣亡沙嶺，十一月得贈都督同知，十二月得賜祭一壇，「仍於本處建祠」。[159]麻岩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以標下中軍援遼，六月升開原副總兵。[160]七月清河之役，岩率軍赴援，然相距過遠而未成。[161]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令管鐵嶺遊擊事，[162]三月，隨馬林攻開原，戰亡二

156 高級歸附人達官多與高官勳貴甚至皇室聯姻，使其得以躋身明朝上層社會，結成利益攸關的集團。見奇文瑛，〈碑銘所見明代達官婚姻關係〉，《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167–181。

157 《明光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卷 4，泰昌元年八月庚戌條，頁 87。

158 姚宗文，〈東閱已竣敬陳遼左事宜疏〉，收入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43，頁 622。

159 〈麻承宗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明熹宗實錄》，卷 29，天啟二年十二月庚辰條，頁 1462。

160 《明神宗實錄》，卷 571，萬曆四十六年六月癸未條，頁 10782。

161 閻鳴泰，《勦事汗語》（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刻本），卷上，〈戊午八月初七日呈三院稟稿〉，頁 48a–48b。

162 《明神宗實錄》，卷 579，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乙亥條，頁 1096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關。[163]自承詔、承訓英年離世後，承宗成為麻貴這一房後裔中年齡最大的家長，麻貴葬禮也是承宗率承宣及諸孫輩操持。[164]但承宗在遼東戰場與侄兒殉國，承恩亦年老而卒，使得承字輩這一代僅剩罷職待罪的承宣。

在這場戰爭裡，令麻氏家族興起的重要成員承恩，在本就待罪的情況下遭受進一步挫折，最終一蹶不振。萬曆四十年（1612），朝廷以原官起用承恩，命其戴罪立功，入遼聽撫、鎮調遣，然因清河之戰時承恩「臨陣分兵佯去」，「借口道檄，急奔開原」，[165]「首鼠遠遁」，[166]神宗怒斥其「聞變退縮」，無「邊臣急難之義」，命勘其罪。四十六年十一月，承恩上本請罪，希望可以再次戴罪立功，未允，十二月革任，次年三月論斬。周永春（1573–1639）援引遼地納馬贖罪的舊例，上書請求讓承恩獻馬免死，神宗允之。承恩雖以千匹壯馬換回一命，但也因此「家破」，經濟狀況遭到重創。[167]飽受打擊的承恩，在天啟元年老病而卒。[168]

除承恩外，承宣也因作戰畏葸遭懲，萬曆四十七年，其與數名將領各帶家丁，會合西寧祁氏、莊浪魯氏等發兵出關，但頗受糧餉不濟困擾。[169]天啟元年二月攻打吳天真起事獲捷；[170]然三月瀋陽之戰，明軍

163 高汝栻輯，《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5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 9，頁 757。

164 〈麻貴夫婦合葬墓誌〉。

165 《明神宗實錄》，卷 497，萬曆四十年七月丁酉條，頁 9362；卷 571，萬曆四十六年六月乙亥條，頁 10772；卷 573，萬曆四十六年八月丁丑條，頁 10833。

166 閻鳴泰，《勦事汗語》，卷上，〈己未正月二十八日查勘清蹼詳語〉，頁 69a。

167 《明神宗實錄》，卷 574，萬曆四十六年九月己丑條，頁 10846；卷 576，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甲午條，頁 10898；卷 577，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丁卯條，頁 10927；卷 580，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丁亥條，頁 10973；卷 583，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丙子條，頁 11107；卷 586，萬曆四十七年九月丙戌條，頁 11218。

168 《明熹宗實錄》，卷 11，天啟元年六月丙戌條，頁 565；卷 12，天啟元年七月戊辰條，頁 635；《明熹宗實錄》，附錄收錄梁鴻志藏本，卷 39，天啟四年二月甲寅條，頁 2287。

169 楊嗣昌著，梁頌成點校，《楊嗣昌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 點校本），卷 1，〈算調募遼兵請借拖欠金花稿〉，頁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敗，年底追究失事文武諸臣罪，承宣因征討不力且有逃狀，故被「戴罪降級提問」。[171]實際上承宣「雖任遼而未管事」，既無權限，也乏機會，頗受裁抑，就連朝廷獎賞援遼諸將時，遼撫王化貞（1582–1632）都極力反對承宣受賞。[172]而這很可能是因為熊廷弼（1569–1625）二度任經略時，與王化貞「經、撫不和」，承宣作為廷弼所關照擢用的熟識部將，[173]不可避免地捲入這場鬥爭，成為化貞仇視下的犧牲品。晚年的「廢將」承宣經濟生活狀況逐漸沒落，崇禎六年（1633），其包含 6 兩廩給銀在內的 72 兩俸銀，以節省公費名義被悉數刪除。[174]人馬、銀餉的罰沒與折損，敗將、逃將身分帶來的政治地位黜落，都使得麻家的政治經濟實力在明末逐漸衰退。

另一方面，麻氏部曲勢力因援遼戰爭遭受極大損失。麻氏原本就「自備家丁甲馬援遼八年，數萬之產，賠費罄盡」，「闔家子侄，通鎮親友，皆為貸處」，已經債臺高築；麻氏大量家丁「久隨來遼」，經過大戰後，「或死（於）敵，或隸他帥」，[175]戰爭損耗相當驚人。即便子侄接續，家丁也越打越少，難以凝聚，如麻家本來有數以千計的勇壯家丁，清河戰敗後承恩革任，只遺下一千餘名健丁，由侄麻岩代管；[176]麻岩在薩爾滸之戰陣亡後，又僅餘數百家兵遺留，只好由同族麻蓁暫管。[177]連熊廷弼都覺得戰亂後的麻家部曲健丁要想再聚，都不知「當從何處搬

170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 3，頁 107。

171 《明熹宗實錄》，卷 17，天啟元年十二月庚午條，頁 834。

172 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卷 3，〈遵旨復命疏〉，頁 17b。

173 熊廷弼，《熊廷弼集》，卷 17，〈前經略書牘第一・答大同道張玄中〉，頁 851。

174 《崇禎存實疏鈔》，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81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影印），卷 4，〈監視大同糧餉太監劉文忠為請裁可省公費等事題本〉，頁 363。

175 熊廷弼，《熊廷弼集》，卷 11，〈前經略奏疏第五・酌議贖罪疏〉，頁 521。

176 陳王庭，〈據實查參懲玩疏〉，收入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10，頁 376。

177 韓原善，〈危遼不容再壞畫策宜圖萬全條議〉，頁 663–66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取」，連連喟歎「遼中之事，李氏釀禍，麻氏死難；李氏脫罪，麻氏抵刑。而又苦其父兄，以傷子侄」。[178]雖然熊廷弼出於與麻氏舊誼，可能帶有一絲同情，但其中所言麻氏父兄子侄之苦，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更何況在戰後清算中，承恩、承宣被罷黜、奪俸、罰馬導致破產，欲恢復豢養家丁的財政基礎無以為繼，麻氏的家丁勢力可以說再難復原。

邊將以家丁奮戰，某種程度上是依托於「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鼓勵少數精銳衝鋒取勝的「奇巧」。如劉綎（1552–1619）、杜松（?–1619）、馬林、李如柏（1553–1620）均有諸多家丁，在他們早期北抗蒙古、東征朝鮮以及在西南地區的諸多戰役中曾充精銳，屢立戰功。但時移世易，在萬曆末期努爾哈齊（1559–1626，1616–1626 在位）崛起，而明朝邊防日益腐敗的情形下，缺乏足夠素質驍強的正規軍配合，少數的精勇家丁在戰場上僅得抱薪救火之效，更在薩爾滸之役中敗亡殆盡。戰爭形勢與地緣政治的變化，單一將領或家族不僅未能左右，有時反而淪為犧牲品。

而且，在財政有限的情況下，少數家丁侵漁大量經制正兵旗軍應有的薪俸，不僅降低普通軍兵生活水準，破壞士氣，也會影響裝備、技術等諸多方面的訓練，導致「軍日減則家丁日增，家丁日增則行伍日虛」，甚至出現給糧不濟、軍士鳩形鵠面的情形。[179]薩爾滸戰後，徐光啟（1562–1633）曾經總結敗因，批判「今地大人眾，而不選不練，征兵十萬，大半脆弱，集合諸將，僅得精勇家丁數千，又分四路」，若對抗「奴這二十年選練，犀利精強」的兵馬，是「恒以大眾敵我偏師」。[180]賽凱遼東御史方震孺（1585–1645），發現所招兵員多「不中用」，甚至「折手斷

178 熊廷弼，《熊廷弼集》，卷 11，〈前經略奏疏第五・酌議贖罪疏〉，頁 521。

179 翟鳳翀，《疏草燼餘》（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藏翟左髯校錄本），第 4 疏〈再陳東奴情狀疏〉，頁 19b；第 5 疏〈警報軍士三月無糧疏〉，頁 21b。

180 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 點校本），卷 3，〈練兵疏稿一・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頁 102。關於明末軍餉之難，可參奥山憲夫，〈明末における軍の給与支給上の弊害について〉，《国士舘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第 25 號（1992 年 10 月），頁 43–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臂者」。且遼東當地米價時已高達每斗一兩二錢，朝廷所發賞錢一金只能買米八升，待遇低下，導致兵員厭戰情緒重，每過一日就紛紛「拱手而賀曰『又做了一日人矣』」。[181]遼東新餉司單崇（1587–1644）親自犒軍，發現牛酒蒙受塵汙，而「諸軍嗽之如飴」，「不覺潸然淚下」。[182]

若無大量訓練有素、鬥志昂揚的正兵壓陣，少量衝鋒家丁根本無法挽救戰爭頹勢。援遼時這種敗象屢顯端倪：萬曆四十三年（1615），麻承恩在正軍援兵因「缺餉」、「枵腹」而四散的情況下，被迫「帥一旅之孤軍東奔西馳，捉襟肘見」，[183]但此前其實他已「久客於遼，歲費遼餉三萬金」；[184]四十七年冬，遼撫周永春又命承恩守三岔河，本打算在其家丁以外，配備萬名額兵「佐之」，並多蓄火炮，[185]但直至次年夏天，承恩帳下只湊齊三千正兵，且多是新招，「盔甲俱無，馬匹尚缺」，遑論火器。[186]來遼東頒詔的張鼐（1572–1630）看到承恩的窘態後，一針見血地指出「欲其申威闔外，難矣」。[187]數月後，這批兵卒紛紛奔逃廣寧，[188]遼事的結局就在類似錯誤的積累裡，不可逆轉地敗壞。

由是可知，隨著承恩、承宣諸人因戰敗清算導致政治、經濟失勢，以及承宗、岩等人的陣亡，部曲、財力的喪失與崩潰，都重創麻氏家族力量。麻氏的衰落與明末國勢衰微互為表裡，某種程度上體現出邊鎮衛所軍事家族與國家朝廷間的命運連結：邊鎮衛所將門的廢弛與恬嬉不振

181 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卷 3，〈直述危遼情形疏〉，頁 9b–10a。

182 單崇，〈單烈愍公遺文〉，收入單崇等，《高密單氏詩文匯存》（濟南：山東省圖書館藏石印本），第 2 冊，頁 2a–2b。

183 王雅量，《長馨軒集》（濟南：山東省圖書館藏鈔本），卷 1，〈題北關嫁女招鬱〉，頁 60–61。

184 翟鳳翀，《疏草燼餘》，第 3 疏〈請求制馭東奴疏〉，頁 14b、19a。

185 周永春，〈請兵戍守要地疏〉，收入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31，頁 242。

186 周永春，〈奸細供報夷虜合謀疏〉，收入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卷 37，頁 591。

187 張鼐，《寶日堂初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 5 輯第 23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 據明崇禎刊本影印），卷 30，〈使東日記并序〉，頁 422。

188 熊廷弼，《熊廷弼集》，卷 19，〈前經略書牘第三・答周毓陽中丞〉，頁 973。

臺灣大學圖書館明清資料庫

影響征遼的軍事局勢，征遼失敗也消耗了邊軍力量，從而使明朝頹勢愈顯，將門更加衰落。麻氏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

## 餘　論

由遼東戰事引發的明清易代，給麻氏為代表的邊鎮將門帶來了最致命的衝擊。雖然麻家亦有如胤揚由明降清、加入綠營的案例，[189]但一代即止，再無承續，而且仕履遠離宣大本鄉。明清鼎革是導致麻氏將門徹底消亡的決定性因素。不管是作為邊鎮將門的麻氏，還是作為回回後裔衛所達官的麻氏，在明後期都已融入明朝統治集團，他們在明清易代中成為捍衛明朝政權存續的國家力量，援遼滅虜、征剿流寇都有他們的身影。入清後，麻氏既不能以官方身分獲得承認，大同密邇京畿，也難以地方大族的力量繼續獲得重用，其社會、政治地位的下降是當然之理。身處滿洲八旗、綠營之下，麻氏的命運被清政權所決定。在明代，邊鎮衛所將領是帝國的要角之一，入清後的他們如失根蘭草，即將夭折，而榆林姜氏起兵造反，僅是在窘境中孤注一擲。康熙以後，即使功勞最大的三藩都被視為眼中釘，麻氏就更不須言。

明後期邊鎮將門的興起與維持，發生在王朝制度設計下鎮戍營伍制的推廣，這與九邊防禦危機密切相關。舊有制度漸不敷用，「邊將必用本土之人」成為時代所需。[190]以麻氏為代表的舊邊鎮衛所武官，在新鎮戍營兵體制下獲得機會。他們依靠制度保障下的軍功持續，而軍功持續，既需要父子兄弟在政治、經濟、人力方面的長期本土經營，也有賴邊鎮文官甚至廷臣的支持及保護。而獲得一方支持，難免帶來另一面的反對與奏劾，這也是政治上的危險因素。武將憑依戰功，但勝敗無常，戰敗

189 胤揚事參彭而述，《讀史亭詩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文集卷 6，〈麻將軍初度序〉，頁 8a–9b。

190 《明憲宗實錄》，卷 234，成化十八年十一月癸丑條，頁 39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身損耗及戰後清算，都是導致其崩潰的直接導火線。九邊將門興盛與明代中後期的政治、戰爭局勢密切相關，其衰落也由之於此。乃至於明清易代，原本的九邊「邊鎮」成為新朝「內地」、衛所制度最終解體，麻氏為代表的邊鎮衛所將門失去了生長根基，清朝的政治局勢和其他多方面的複雜因素，使他們從「世傳將種」到「隳其家聲」，最終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此外，自世族門閥在唐季五代逐漸陵夷以後，就罕見異代興盛的文武家族，即使有，亦多依靠持續的科舉、軍功而非門第本身。麻氏在易代之後，既未能轉化為科舉望族，亦缺乏在新朝持續從軍立功的條件，最後甚至因經濟匱乏而遠離鄉土，後人在清代雖有個別人才而不能興旺，實由大勢所限。

除崇禎末到南明，武將出現較為明顯的軍閥化，君難馭將之外，明後期大部分時期，將門並不能在政治上完全獨立於中央，且受文官體系制約。武將曲意討好文官，背後折射的是文官既可分兵權，又能動輒奏彈武將的威權一面。萬曆中曾橫行一時、縱卒嘩噪的麻承恩，萬曆末亦頻受掣肘，被迫「以三坌河大將，統兵不滿三千，而寓居會城外一驛中」，難免讓他「傷弓之餘，氣頗不振」，[191]遑論抵抗軍國體制下士氣旺盛的金國。更何況作戰之時，決策「肉食者」文官們對前線的牽絆豈止如此：「戰剿」有「挑釁」之患，「羈縻」有「示弱」之譏，「不救」有「觀望」之罪，既空兵腹，又束將手，「閫外」亦不能相機「自決」。[192]武人長期「不得展布」的局面，是征遼不勝的原因之一。

以麻氏為代表的邊鎮衛所將門，在邊事孔棘的特殊背景下產生，長期受朝廷文官體制嚴密控制，其權力乃至由此發展的經濟與武裝力量，都源於朝廷的授予，故仍受到強力支配與監督。進一步講，文官體制掌控了邊鎮將門的任職銓選、功罪考核、薪俸發放乃至政治生活等諸多方面。作為衛所世襲武官，襲替、擢降都要經過中央與地方各級文官之手；

191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 30，〈使東日記并序〉，頁 422。
192 王雅量，《長馨軒集》，卷 1，〈題北關嫁女招禦〉，頁 6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作為鎮戍營伍武官，選拔開伍、評定考核，又多需在督撫按道的彙報奏語之內轉圜臧否，甚至文墨小吏，都不好輕易開罪。他們是明後期軍政制度的產物，無法對抗國家和時代。並無前人所言那般「尾大不掉」的軍閥化特質，[193]一旦時移世異，他們很容易被朝廷摒斥。明清戰爭拉開序幕後，不僅麻氏一家，隆、萬間興起的各家「將門」不約而同趨於沒落，除去遼事中的戰力敗損，戰後清算也是重要原因。

即便能如遼東李氏般獲承天寵，將門的輝煌亦僅是一時之榮；源源不斷壯大、具有文化和法律權力的文官菁英集體，卻是樹大根深、長久存在。以個別的寵幸挑戰長遠、制度性的力量，孰勝孰敗，不言而喻。邊鎮衛所將門看似世將傳家，威風八面，然而其受文官管理制約，並不具備足夠挑戰文官與朝廷的資本，更達不到形成緊密團結的新武將集團的條件，與明前期活躍的勳貴武臣並不相同。有時連皇帝的態度都頗為微妙，時人曾分析皇帝對邊將的稱呼變化：「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者。正德以前，侯伯為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以李寧遠之開邑封，戚將軍之位三孤，直斥姓名，重者僅稱爾，恐亦非故事也。」[194]其中洵有深意在焉。

*本文是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韓國漢文史部文獻編年與專題研究」（2021ZD242）的階段性成果。蒙業師孫衛國先生指導，先後得到吳承山先生、麻玉先生、肖立軍先生、奇文瑛先生、孫齊先生、王德碩先生、鄭春奎先生、朱芳德先生在思路或資料等方面的啟發與幫助，投稿後又蒙兩位審查委員及編輯先生賜以寶貴意見，一併致以誠摯感謝！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193 曹循，〈明後期的邊鎮將門〉，頁 31–32。

194 王世貞撰，《觚不觚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第 26 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據民國二十年〔1931〕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影印），頁 21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 引用書目

## 一、史料文獻

〈天啟二年重修禮拜寺碑記有銘〉。大同：大同清真大寺藏。(“Tianqi ernian chongxiu libaisi beiji youming.” Datong: Datong qingzhen dasi.)

〈尹氏墓誌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右玉縣委員會編，《右玉文史資料》第 24 輯，頁 123–124。(“Yinshi muzhiming.” In *Youyu wenshi ziliao*. Vol. 24, 123–24.)

〈兌樓祁公墓誌銘〉。蔚縣：蔚縣博物館藏。(“Duilou Qigong muzhiming.” Yuxian: Yuxian bowuguan.)

〈沈氏墓誌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右玉縣委員會編，《右玉文史資料》第 24 輯，頁 118–119。(“Shenshi muzhiming.” In *Youyu wenshi ziliao*. Vol. 24, 118–19.)

〈明威將軍范君墓誌銘〉。右玉：右玉縣博物館藏。(“Mingwei jiangjun Fanjun muzhiming.” Youyu: Youyuxian bowuguan.)

〈明萬曆十二年「翰雲」門額刻石〉拓本。赤城：赤城縣博物館藏。(“Ming Wanli shiernian ‘Han Yun’ mene keshi.” Chicheng: Chichengxian bowuguan.)

〈馬母師氏合葬墓誌〉。蔚縣：蔚縣博物館藏。(“Mamu shishi hezang muzhi.” Yuxian: Yuxian bowuguan.)

〈崇禎元年重修右衛禮拜寺碑記〉。右玉：右玉清真寺藏。(“Chongzhen yuannian chongxiu youwei libaisi beiji.” Youyu: Youyu qingzhensi.)

〈麻氏家族抄件〉。右玉：右玉縣麻氏家族後裔麻玉先生藏本。(“Mashi jiazu chaojian.” Youyu: Youyuxian mashi jiazu houyi mayu xiansheng cangben.)

〈麻承宗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Ma Chengzong muzhi.” In *Mashi jiazu beikequn*.)

〈麻承訓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Ma Chengxun muzhi.” In *Mashi jiazu beikequn*.)

〈麻富夫婦合葬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Ma Fu Fufu hezang muzhi.” In *Mashi jiazu beikequn*.)

〈麻貴夫婦合葬墓誌〉，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Ma Qui Fufu hezang muzhi.” In *Mashi jiazu beikequn*.)

〈麻祿墓誌蓋〉，收入《麻氏家族碑刻群》。(“Ma Lu muzhigai.” In *Mashi jiazu beikequn*.)

〈麻續先墓碑〉，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右玉縣委員會編，《右玉文史資料》第 24 輯，頁 126–127。(“Maxuxian mubei.” In *Youyu wenshi ziliao*. Vol. 24, 126–27.)

〈萬曆十年麻氏三輩刻石〉。赤城：赤城縣雲州鄉龍門摩崖。(“Wanli shinian Mashi sanbei keshi.” Chicheng: Chichengxian Yunzhouxiang longmen moya.)

〈萬曆三年敗胡堡「永寧」石匾〉，收入周亮等編，《三晉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魯區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Wanli sannian baihubao ‘Yong Ning’ shibian.” In *Sanjin shike daquan: Shuozhoushi Pingluqu juan*. Edited by Zhou Liang et al. Taiyuan: Sanjin Press, 2012.)

〈遼東副總兵祁公墓誌銘〉。蔚縣：蔚縣博物館藏。(“Liaodong fuzongbing Qigong muzhiming.”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Yuxian: Yuxian bowuguan.)
〈蘭溪馬公墓誌銘〉。蔚縣：蔚縣博物館藏。(“Lanxi Magong muzhiming.” Yuxian: Yuxian bowuguan.)
《正德十二年進士登科錄》，收入方芳等點校，《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中冊。寧波：寧波出版社，2016。(*Zhengde shiernian jinshi dengkelu*. In *Tianyige cang Mingdai kejulu xuankan: dengkelu*. Vol. zhong. Ningbo: Ningbo chubanshe, 2016.)
《兵部武選司條例》，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 1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10 據天一閣藏明本影印。(*Bingbu wuxuansi tiaoli*. In *Tianyige cang Mingdai zhengshu zhenben congkan*. Vol. 14.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2010.)
《兵部奏疏》。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7 據北京國圖明鈔本影印。(*Bingbu zoushu*. Beijing: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 2007.)
《明太祖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Taizu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4.)
《明世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Shizong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5.)
《明光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Guangzong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6.)
《明孝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Xiaozong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4.)
《明神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Shenzong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6.)
《明憲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Xianzong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4.)
《明熹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Xizong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資料庫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6.)

《明穆宗實錄》，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Ming Muzong shilu*. I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ed. *Ming shilu*. Taipe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ian yanjiusuo, 1965.)

《崇禎存實疏鈔》，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81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影印。(*Chongzhen cunshi shuchao*. In *Zhongguo Mingchao dangan zonghui*. Vol. 81.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2001.)

《麻氏家族碑刻群》。右玉：右玉縣博物館藏。(*Mashi jiazu beikequn*. Youyu: Youyuxian bowuguan.)

《朝鮮宣祖實錄》。漢城：東國文化社，1961 據太白山史庫本影印。(*Chaoxian Xuanzu shilu*. Hancheng: Dongguo wenhuashe, 1961.)

《新官襲職選底》，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75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影印。(*Xinguan xizhi xuandi*. In *Zhongguo Mingchao dangan zonghui*. Vol. 75.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1.)

《蔚州衛選簿》，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70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影印。(*Weizhou wei xuanbu*. In *Zhongguo Mingchao dangan zonghui*. Vol. 70.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1.)

《瀋陽群牧所襲替世襲簿》，收入《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 75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據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影印。(*Shenyang qunmusuo xiti shixibu*. In *Zhongguo Mingchao dangan zonghui*. Vol. 75.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1.)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47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據明萬曆平陰于緯刻本影印。(Yu Shenxing. *Gucheng shanguan wenji*. In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Vol. jibu. No. 147. Jinan: Qilu shushe, 199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右玉縣委員會編，《右玉文史資料》第 23 輯。右玉：山西省右玉縣史志辦公室，2015。(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Shanxisheng Youyuxian weiyuanhui, ed. *Youyu wenshi ziliao*. Vol. 23. Youyu: Shanxisheng Youyuxian shizhi bangongshi, 2015.)

——，《右玉文史資料》24 輯。右玉：山西省右玉縣史志辦公室，2016。(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Shanxisheng Youyuxian weiyuanhui, ed. *Youyu wenshi ziliao*. Vol. 24. Youyu: Shanxisheng Youyuxian shizhi bangongshi, 2016.)

方逢時撰，李勤璞校注，《大隱樓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Fang Fengshi. *Dayinlou ji*.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2009.)

方震孺，《淮南方孩未先生全集》。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Fang Zhenru. *Huainan Fanghaiwei xiansheng quanji*. Tianjin: Nankai daxue tushuguan.)

王 忬，《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Wang Yu. *Yushi dafu Sizhi Wanggong zouyi*. Taipei: Guojia tushuguan.)

王世貞，《�obj不鮥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26 冊。成都：巴蜀書社，2000 據民國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二十年（1931）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影印。(Wang Shizhen. *Gubugu lu*. In *Zhongguo yeshi jicheng xubian*. Vol. 26. Chengdu: Bashu shushe, 2000.)

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3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Wang Zaijin. *Sanchao liaoshi shilu*. In *Xuxiu siku quanshu*. Vol. 437.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王崇古著，張志江點校，《少保鑒川王公督撫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Wang Chonggu. *Shaobao Jianchuan Wanggong dufu zouy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1.)

王雅量，《長馨軒集》。濟南：山東省圖書館藏鈔本。(Wang Yaliang. *Changxinxuan ji*. Jinan: Shandong sheng tushuguan.)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點校本。(Sima Qian. *Shij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2.)

申時行，《綸扉簡牘》，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16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刻本影印。(Shen Shixing. *Lunfei jiandu*. In *Siku jinhuishu congkan*. Vol. jibu. No. 161.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7.)

朱正色，《自敘紀事》。邢臺：南和朱氏家族藏明後期抄本。(Zhu Zhengse. *Zixu jishi*. Xingtai: Nanhe Zhushi jiazu.)

吳　亮，《止園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Wu Liang. *Zhiyuan ji*.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吳允中，《宣雲約法榜示》。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Wu Yunzhong. *Xuanyun yuefa bangshi*. Washington: Library of Congress.)

李　植，《言事紀略》。東京：前田育德會藏明萬曆刻本。(Li Zhi. *Yanshi jilue*. Tokyo: Maeda Ikutokukai.)

李化龍，《撫遼疏稿》，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6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Li Hualong. *Fuliao shugao*. In *Siku jinhuishu congkan*. Vol. shibu. No. 69.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7.)

李維楨纂修，萬曆《山西通志》。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刻崇禎補刻本。(Li Weizhen. *Wanli Shanxi tongzhi*. Tokyo: Kokuritsu kōbunshokan Naikaku bunko.)

沈一貫，〈司禮監太監渭川田公墓誌銘〉，收入李昱等，《北京市石景山區歷代碑志選》。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Shen Yiguan. “Silijian taijian Weichuan Taingong muzhiming.” In *Beijing shi Shijingshan qu lidai beizhi xuan*. Edited by Li Yu et al. Beijing: Tongxin chubanshe, 2003.)

——，《敬事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35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刊本影印。(Shen Yiguan. *Jing shi cao*. In *Xuxiu siku quanshu*. Vol. 1358.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沈子木，《督撫三晉疏鈔》。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後期刊本。(Shen Zimu. *Dufu Sanjin shuchao*. Tokyo: Kokuritsu kōbunshokan Naikaku bunko.)

沈　涵，〈虜情漸改邊事可虞疏〉，收入張鹵編，《皇明嘉隆疏鈔》，收入《四庫全書存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目叢書》史部第 73 冊，卷 16，頁 262–263。濟南：齊魯書社，1997 據明刻本影印。(Shen Han. “Luqing jiangai bianshi keyu shu.” In *Huangming jialong shuchao*. Edited by Zhang Lu. In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Vol. shibu. No. 73. Jinan: Qilu shushe, 199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Shen Defu. *Wanli yehuo b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59.)

邢 玠，《經略禦倭奏議》，收入《禦倭史料匯編》第 4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 據明刻本影印。(Xing Jie. *Jinglue yuwo zouyi*. In *Yuwo shiliao huibian*. Vol. 4. Beijing: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 2004.)

來 臨，崇禎《蔚州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第 1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據日藏明崇禎刻本影印。(Lai lin. *Chongzhen Yuzhou zhi*. In *Riben cang Zhongguo hanjian difangzhi congkan xubian*. Vol. 1. Beijing: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 2003.)

周永春輯，《絲綸錄》，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7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Zhou Yongchun, ed. *Silun lu*. In *Siku jinhuishu congkan*. Vol. shibu. No. 74.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7.)

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曆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Nan Bingwen, and Wu Yanling, eds. *Jijiao Wanli qijuzhu*.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she, 2010.)

姜良棟，《東征錄》。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刊本。(Jiang Liangdong. *Dongzheng lu*. Tokyo: Kokuritsu kōbunshokan Naikaku bunko.)

姜際龍，《新續宣府志》，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地方志珍本叢刊》第 18 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據清初鈔本影印。(Jiang Jilong. *Xinxu Xuanfu zhi*. In *Guojia tushuguan cang difangzhi zhenben congkan*. Vol. 18.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she, 2016.)

胡元朗，乾隆《天鎮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Hu Yuanlang. *Qianlong Tianzhen xianzhi*.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胡文燁等纂修，許殿璽、馬文忠點校，順治《雲中郡志》。大同：大同市地方志辦公室，1988。(Hu Wenye et al., eds. *Shunzhi Yunzhong junzhi*. Datong: Datong shi difangzhi bangongshi, 1988.)

苕上愚公，《東夷考略》。臺北：正中書局，1981 據玄覽堂叢書本影印。(Tiaoshang Yugong. *Dongyi kaolue*.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1981.)

孫 鑛，《姚江孫月峰先生全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 3 輯第 91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5 據清嘉慶重刻本影印。(Sun Kuang. *Yaojiang Sunyuefeng xiansheng quanji*. In *Ming bieji congkan*. Vol. 3. No. 91. Hefei: Huangshan shushe, 2015.)

孫居相，《兩臺疏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Sun Juxiang. *Liangtai shucao*. Taipei: Guojia tushuguan.)

徐 鑾，《職方疏草》。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刻本。(Xu Luan. *Zhifang shucao*. Tokyo: Kokuritsu kōbunshokan Naikaku bunko.)

徐光啟撰，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 點校本。(Xu Guangqi. *Xu Guangqi j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汝栻輯，《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35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Gao Rushi, ed. *Huangming xuji sanchao fazhuan quanlu*. In *Xuxiu siku quanshu*. Vol. 357.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張　欽纂修，正德《大同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8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據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影印。(Zhang Chin, ed. *Zhengde Datong fuzhi*. In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Vol. shibu. No. 186. Jinan: Qilu shushe, 1997.)

張　鼐，《寶日堂初集》，收入《明別集叢刊》第 5 輯第 23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6 據明崇禎刊本影印。(Zhang Nai. *Baoritang chuji*. In *Ming bieji congkan*. Vol. 5. No. 23. Hefei: Huangshan shushe, 2016.)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點校本。(Zhang Tingyu. *Ming s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4.)

張佳胤，《居來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51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Zhang Jiayin. *Julai shanfang ji*. In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ubian*. Vol. 51. Jinan: Qilu shushe, 2001.)

張居正著，吳量愷等點校，《張居正集》。武漢：荊楚書社，1987。(Zhang Juzheng. *Zhang Juzheng ji*. Wuhan: Jingchu shushe, 1987.)

張貞觀，《掖垣疏草》。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Zhang Zhenguan. *Yeyuan shucao*.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曹春曉纂修，道光《河曲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Cao Chunxiao, ed. *Daoguang Hequ xianzhi*.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梅國楨，《西征集》。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末刊本。(Mei Guozhen. *Xizheng ji*. Tokyo: Kokuritsu kōbunshokan Naikaku bunko.)

畢自嚴，《石隱園藏稿》。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畢際有刻本。(Bi Ziyan. *Shiyinyuan canggao*.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黃道瞻，〈兵政重寄酌處南北當事大臣疏〉，收入吳亮輯，《萬曆疏鈔》，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 59 冊，卷 1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明萬曆三十七年（1607）刻本影印。(Huang Daozhan. “Bingzheng chongji zhuochu nanbei dangshi dachen shu.” In *Wanli shuchao*. Edited by Wu Liang. In *Siku jinhuishu congkan*. Vol. shibu. No. 59.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7.)

傅淑訓、曹樹聲纂修，萬曆《平陽府志》。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順治遞修本。(Fu Shuxun, and Cao Shusheng, eds. *Wanli Pingyang fuzhi*. Taipei: Guojia tushuguan.)

喬璧星，《喬中丞奏議》。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明刊本。(Qiao Bixing. *Qiaozhongcheng zouyi*. Tokyo: Kokuritsu kōbunshokan Naikaku bunko.)

單　崇，〈單烈愍公遺文〉，收入單崇等，《高密單氏詩文匯存》，第 2 冊，頁 2a–2b。濟南：山東省圖書館藏石印本。(Shan Chong. “Shan Liemingong yiwen.” In *Gaomi Shanshi shiwen huicun*. Vol. 2, 2a–2b.. Jinan: Shandong sheng tushuguan.)

彭而述，《讀史亭詩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刻本。(Peng Ershu. *Dushiting shiwen ji*.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程開祜輯，《籌遼碩畫》，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4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據舊北平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Cheng Kaihu, ed. *Chouliao shuohua*. In *Congshu jicheng xubian*. Vol. 242. Taipei: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 1989.)

周永春，〈奸細供報夷虜合謀疏〉，收入《籌遼碩畫》，卷 37。(Zhou Yongchun. “Jianxi gongbao yilu hemou shu.” In *Chouliao shuohua*. )

周永春，〈請兵戍守要地疏〉，收入《籌遼碩畫》，卷 31。(Zhou Yongchun. “Qingbing shushou yaodi shu.” In *Chouliao shuohua*. )

姚宗文，〈東閱已竣敬陳遼左事宜疏〉，收入《籌遼碩畫》，卷 43。(“Yao Zongwen. “Dongyue yijun jingchen liaozuo shiyi shu.” In *Chouliao shuohua*. )

陳王庭，〈據實查參懲玩疏〉，收入《籌遼碩畫》，卷 10。(Chen Wangting “Jushi chasan chengwan shu.” In *Chouliao shuohua*. )

麻承恩，〈乞覈守援真情疏〉，收入《籌遼碩畫》，卷 12。(Ma Chengen. “Wihe shouyuan zhenqing shu.” In *Chouliao shuohua*. )

韓原善，〈危遼不容再壞畫策宜圖萬全條議〉，收入《籌遼碩畫》，卷 20。(Han Yuanshan. “Weiliao burong zaihuai huace yitu wanquan tiaoyi.” In *Chouliao shuohua*. )

楊一清著，唐景紳、謝玉傑點校，《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點校本。(Yang Yiching. *Yang Yiching j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1.)

楊時寧，《總督宣大山西軍門奏議》。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Yang Shining. *Zongdu xuanda shanxi junmen zouyi*. Taipei: Guojia tushuguan.)

楊嗣昌著，梁頌成點校，《楊嗣昌集》。長沙：嶽麓書社，2008 點校本。(Yang Sichang. *Yang Sichang ji*. Changsha: Yuelu shushe, 2008.)

萬斯同，《明史稿》。寧波：寧波出版社，2008 據天一閣藏寫本影印。(Wan Sitong. *Ming shi gao*. Ningbo: Ningbo chubanshe, 2008.)

鄒維璉，《達觀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183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據吉林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影印。(Zou Weilian. *Daguanlou ji*. In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Vol. jibu. No. 183. Jinan: Qilu shushe, 1996.)

熊廷弼著，李紅權點校，《熊廷弼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Xiong Tingbi. *Xiong Tingbi ji*.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2011.)

翟鳳翀，《疏草燼餘》。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藏翟左髯校錄本。(Zhai Fengchong. *Shucao jinyu*. Xi’an: Xi’an Jiaotong daxue tushuguan.)

劉 城，《嶧桐文集》，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 12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據清光緒養雲山莊刻本影印。(Liu Cheng. *Yitong wenji*. In *Siku jinhuishu congkan*. Vol. jibu. No. 121.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1997.)

劉士銘修，王靄纂，雍正《朔平府志》。劍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雍正刻本。(Liu Shiming, and Wang Ai, eds. *Yongzheng Shuoping fuzhi*.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劉若愚著，馮寶琳點校，《酌中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Liu Ruoyu. *Zhuozhong zhi*. Beijing: Beijing chubanshe, 2018.)

鄭 洛，《鄭襄敏公赤牘》。濟南：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Zheng Luo. *Zheng*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Xiangmingong chidu*. Jinan: Shandong daxue tushuguan.)

鄭汝璧等修，馬希龍等纂，馬少甫等點校，萬曆《延綏鎮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點校本。(Zheng Rubi, and Ma Xilong, eds. *Wanli Yansui zhenz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6.)

閻鳴泰，《勦事汗語》。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刻本。(Yan Mingtai. *Jiaoshi hanyu*.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末薛氏青雷山館鈔本。(Xue Sancai. *Xue Gongmingong zoushu*. Beijing: Guojia tushuguan.)

鍾羽正著，劉序勤等點校，《崇雅堂集》。青州：青州古籍文獻編委會，2008。(Zhong Yuzheng. *Chongyatang ji*. Qingzhou: Qingzhou guji wenxian bianweihui, 2008.)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3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據明萬曆刊本影印。(Qu Jiusi. *Wanli wugong lu*. In *Xuxiu siku quanshu*. Vol. 436.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欒尚約、孫世芳，嘉靖《宣府鎮志》。劍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Luan Shangyue, and Sun Shifang. *Jiajing Xuanfu zhenzhi*.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二、近人研究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臺北：學生書局，1987。(Yue Chih-chia. *Mingdai junhu shixi zhidu*. Taipei: Xuesheng shuju, 1987.)

——，〈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兼論明代軍戶制度中戶名不動代役的現象〉，收入邱澎生、陳熙遠主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頁 44–112。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Yue Chih-chia. “Lun mingdai duoji junhu de junyi gengdai: Jianlun mingdai junhu zhidu zhong huming budong daiyi de xianxiang.” In *Ming Qing falu yunzuo zhong de quanli yu wenhua*, edited by Chiu Peng-sheng and Chen Hsi-yuan, 44–112.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7.)

王文海，〈中華武將世家：麻家將〉，收入李堯、高海主編，《朔州歷史文化研究文集續編》，頁 531–543。太原：三晉出版社，2017。(Wang Wunhai. “Zhonghua wujiang shijia: Ma jia jiang.” In *Shuozhou lishi wenhua yanjiu wenji xubian*, edited by Li Yao and Gao Hai, 531–43. Taiyuan: Sanjin chubanshe, 2017.)

王德功，《麻家將》。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Wang Degong. *Ma jia jiang*. Taiyuan: Sanjin chubanshe, 2008.)

王慧明，〈明代募兵制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論文，2021。(Wang Huiming. “Mingdai mubingzhi yanjiu.” PhD diss., Dongbei shifan daxue, 2021.)

白壽彝，《回族人物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Bai Shouyi. *Huizu renwu zhi*.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1988.)

李大鈞、李大宏，〈山西大同右玉麻氏家世與碑銘〉，收入馬文清主編，《回族譜序與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源考略》，頁 891–899。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Li Dajun, and Li Dahong. “Shanxi Datong Youyu Mashi jiashi yu beiming.” In *Huizu puxu yu zongyuan kaolue*, edited by Ma Wenching, 891–99.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2011.)

吳緝華，〈明初東勝的設防與棄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4 本下冊，1963 年 12 月，頁 649–660。(Wu Chi-hua. “Mingchu Dongsheng de shefang yu chifang.” *Bulletin of IHP* 34, no. 2 [December 1963]: 649–60.)

肖 許，〈明代將帥家丁的興衰及其影響〉，《南開史學》1984 年第 1 期，頁 102–122。(Xiao Xu. “Mingdai jiangshuai jiading de xingshuai ji qi yingxiang.” *Nankai shixue*, no. 1 [1984]: 102–22.)

肖 瑤，《李成梁與晚明遼東政局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Xiao Yao. *Li Chengliang yu wan Ming Liaodong zhengju yanjiu*.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2011.)

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Xiao Lijun. *Mingdai shengzhen yingbingzhi yu defang zhixu*.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she, 2010.)

奇文瑛，〈碑銘所見明代達官婚姻關係〉，《中國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167–181。(Qi Wenying. “Beiming suojian Mingdai daguan hunyin guanxi.” *Zhongguo shi yanjiu*, no. 3 [2011]: 167–81.)

——，《明代衛所歸附人研究——以遼東和京畿地區衛所達官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Qi Wenying. *Mingdai weisuo guifuren yanjiu: Yi Liaodong he Jingji diqu weisuo daguan wei zhongxin*.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2011.)

邱仲麟，〈邊緣的底層：明代北邊守墩軍士的生涯與待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 年第 3 期，頁 147–182、215–216。(Chiu Chung-lin. “Bianyuan de diceng: Mingdai beibian shoudun junshi de shengya yu daiyu.”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no. 3 [2018]: 147–82, 215–16.)

周 松，〈從西蒙古草原到華北平原：明朝忠順營源流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 年第 2 期，頁 39–49。(Zhou Song. “Cong xi Menggu caoyuan dao Huabei pingyuan: Mingchao Zongshun ying yuanliu kao.” *Zhongguo lishi dili luncong*, no. 2 [2012]: 39–49.)

紀海龍，〈麻貴軍旅行實考析〉，《回族研究》2020 年第 2 期，頁 47–52。(Ji Hailong. “Ma Gui junlu xingshi kaoxi.” *Huizu yanjiu*, no. 2 [2020]: 47–52.)

特木勒，〈將帥家丁與明蒙關係：前近代內亞遊牧農耕關係重審〉，《清華元史》2015 年第 3 期，頁 387–417。(Temule Temur. “Jiangshuai jiading yu mingmeng guanxi: qianjindai neiya youmu nonggeng guanxi chongshen.” *Qhinghua Yuan shi*, no. 3 [2015]: 387–417.)

馬楚堅，《明代的家丁》。宜蘭：明史研究小組，1985。(Ma Chu-jian. *Mingdai de jiading*. Yilan: Mingshi yanjiu xiaozu, 1985.)

張祥明，《明代軍政考選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1。(Zhang Xiangming. *Mingdai junzheng kaoxuan zhidu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21.)

曹 循，〈明後期的邊鎮將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3 期，頁 26–32。(Cao Xun. “Ming houqi de bianzhen jiangmen.” *Xibei daxue xuebao* (zhexu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ehui kezxue ban), no. 3 [2014]: 26–32.)

梁志勝，《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Liang Zhisheng. *Mingdai weisuo wuguan shixi zhidu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2.)

郭　紅，〈明代山西行都司移民〉，《軍事歷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頁 102–108。(Guo Hong. "Mingdai Shanxi xingdusi yanjiu." *Junshi lishi yanjiu*, no. 3 [2000]: 102–08.)

陳寶良，〈明代的文武關係及其演變：基於制度、社會及思想史層面的考察〉，《安徽史學》2014 年第 2 期，頁 5–18。(Chen Baoliang. "Mingdai de wenwu guanxi jiqi yanbian: jiyu zhidu, shehui ji sixiangshi cengmian de kaocha." *Anhui shixue*, no. 2 [2014]: 5–18.)

彭　勇，〈論明代忠順營官軍的命運變遷〉，《中州學刊》2009 年第 6 期，頁 183–189。(Peng Yong. "Lun Mingdai Zhongshunying guanjun de mingyun bianqian." *Zhongzhou xuekan*, no. 6 [2009]: 183–89.)

——，《明代北邊防禦體制研究——以邊操班軍的演變為線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Peng Yong. *Mingdai beibian fangyu tizhi yanjiu: Yi biancao banjun de yanbian wei xiansuo*.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2009.)

曾　磊，〈明末關寧軍性質的再討論——以「祖家將」為核心的觀察視角〉，《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 年第 1 期，頁 107–116。(Zeng Lei. "Ming mo Guanningjun xingzhi de zai taolun: yi 'Zu jia jiang' wei hexin de guancha shijiao."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no. 1 [2020]: 107–16.)

黑正宏，〈明王朝的另一個長城——麻貴〉，《回族研究》2011 年第 3 期，頁 45–49。(Hei Zhenghong. "Ming wangchao de lingyige changcheng: Ma Gui." *Huizu yanjiu*, no. 3 [2011]: 45–49.)

楊向豔，《沈一貫執政與萬曆黨爭：以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Yang Xiangyan. *Shen Yiguan zhizheng yu Wanli dangzheng: yi chuzong, yaoshu, jingcha sanshi wei zhongxin de kaoch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18.)

楊海英，〈明清易代之際的張應種及其家族〉，《軍事歷史》2017 年第 6 期，頁 21–27。(Yang Haiying. "Ming Qing yidai zhiji de Zhang Yingzhong jiqi jiazu." *Junshi lishi*, no. 6 [2017]: 21–27.)

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21–196。(Yeh Kao-shu. "Ming Qing zhiji Liaodong de junshi jiazu: Li, Mao, Zu sanjia de bijiao." *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o. 42 [December 2009]: 121–96.)

綿貫哲郎，〈再論祖大壽與「祖家將」〉，《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6 期，頁 26–40。(Watanuki Tetsuro. "Zailun Zu Dashou yu 'Zujiajiang.'" *Jilin shif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no. 6 [2017]: 26–40.)

趙中男，〈論明代軍事家丁制度的歷史地位〉，《中國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北京，頁 158–166。(Zhao Zhongnan. "Lun Mingdai junshi jiading zhidu de lishi diwei." *Zhongguo shi yanjiu*, no. 4 [1991]: 158–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玉珍，〈明清時期長城沿線回民聚落的變遷——以大同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1。(Zhao Yuzhen. “Ming Qing shiqi changcheng yanxian huimin juluo de bianqian: yi Datong wei zhongxin.” Master’s thesis, Zhongyang minzu daxue, 2011.)

鄧志峰，《王學與晚明師道復興運動》。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Deng Zhifeng. *Wangxue yu wan Ming shidao fuxing yundong*.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20.)

盧緒友，〈明初東勝州衛置廢諸問題辨析〉，收入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35 輯，頁 189–19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Lu Xuyou. “Ming chu Dongsheng zhouwei zhifei zhuwenti bianxi.” In *Yuanshi ji minzu yu bianjiang yanjiu jikan*. Vol. 35, edited by Liu Yingsheng, 189–93.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8.)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Tan Qixiang. *Zhongguo lishi ditu ji*. Beijing: Zhongguo ditu chubanshe, 1996.)

小野和子著，李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Ono Kazuko. *Ming ji dangshe kao*. Translated by Li Qing and Zhang Rongme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3.)

谷口規矩雄，〈明末北邊防衛における「債帥」について〉，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頁 1–22。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Taniguchi Kikuo. “Min matsu hokuhen bouei ni okeru ‘saisui’ ni tsuite.” In *Min matsu Shin sho no shakai to bunka*, edited by Ono Kazuko, 1–22. Kyoto: Kyoto daigaku jimbun kagaku kenkyusho, 1996.)

奥山憲夫，〈明末における軍の給与支給上の弊害について〉，《国士舘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第 25 號，1992 年 10 月，頁 43–54。(Okuyama Norio. “Min matsu ni okeru gun no kyūyo shikyū ue no heigai ni tsuite.” *Kokushikan daigaku bungaku-bu jimbun gakkai kiyō*, no. 25 [October 1992]: 43–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5 (Jun. 2025), pp.61–11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06_(75).0002

# Research on the Ma Clan of the Datong Military Fortres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Xu, Cheng*

##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Ma clan, represented by Ma Lu, Ma Jin, Ma Gui and Ma Cheng'en, was formed in Datong Zhen. The family first arose from "Huihui people"[195] who had moved from Dongsheng Zhou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an ordinary military household; however, due to the Jingnan War it obtained a low-ranking official status. The tense border defens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gav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ir status to rise. Their family was martial; moreover, they main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armed forces. In every war they engaged in, the Ma family won numerous victories and accumulated considerable manpower, property, and other assets. The family had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area for a long time. Even when they were transferred, they were usually transferred to nearby places. Moreover, the entire Ma family often worked together in the same camp, or even held the same position continuously, so they had rich career experience and relationships. Given their attitude of valuing culture over martial arts, the Ma family cultivated

* Ph.D. Candidate, History College of Nankai University
No. 38, Tongyan Road, Jinnan District, Tianjin, P. R. China 300350;
E-mail: thomasxc@foxmail.com

195 Huihui (回回) was a term for China's Muslims (White Hui), Persian Christians (Black Hui) and Jews (Blue Hu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iendships with their superior civilian official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family. However, following a series of wars in the late Ming, their manpower a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suffered heavy losses and went into gradual decline. After the formation the Qing Dynasty, some Ma family members tried to form the Green Banner Army but failed to carry on, and the Ma clan declined further.

Generally, the Jiangmen (the frontier general family) represented by the Ma clan, was essentially a military family with tangible economic and armed strength that had been controll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for a long time. Its rise and fall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eve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was essentially the product of the crises of the times and influences of the system, inseparable from the design of the country's military system.

**Keywords:** Late Ming dynasty, Datong Zhen (Military Fortress), Military Household in Garrisons, Ma Clan, Zhenshu Yingwu System (Garrison and Battalion Syste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